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五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三年三月

## 《臺灣鄭氏紀事》與鄭成功和臺灣 歷史書寫：從江戶日本到清末中國

藍弘岳\*

《臺灣鄭氏紀事》的內容以鄭成功家族事蹟為主，是水戶藩儒者川口長孺受藩主德川齊脩指示所編纂的臺灣史書。《臺灣割據志》則是《臺灣鄭氏紀事》的底稿。本文首先透過對這兩個版本的檢討，探究在《臺灣鄭氏紀事》編纂過程中，明清中國所生產關於鄭氏家族和臺灣史的文本在江戶日本的脈絡中，如何被閱讀、轉譯和重新詮釋等問題，以論證水戶藩儒者如何建構具日本中心華夷秩序觀念的臺灣歷史書寫的過程與意義。其次，筆者論析《臺灣鄭氏紀事》對於江戶後期乃至明治時期鄭成功和臺灣歷史書寫的影響。其中，本文特別關注《臺灣鄭氏紀事》出版後，在幕末、明治時期，受西方勢力進逼和江戶儒學發展的影響下，鄭成功的日本母親如何逐漸受到關注與討論，及其母親之「烈婦」形象與鄭成功之日本英雄形象形成的關聯。然後，討論鄭成功活躍於海洋的事蹟如何被收編為日本歷史記憶的過程。《臺灣鄭氏紀事》與明治時期出現的「臺灣舊領」（臺灣是日本舊有領土）論述之關聯，也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最後，本文也探究江戶時代以來有關鄭成功和臺灣的歷史書寫又如何清末中國的脈絡中被利用、重新詮釋。進而，我們將在東亞知識史、思想史乃至全球史視野中，思考《臺灣鄭氏紀事》的意義與重要性，及東亞內部知識流動的特質。

**關鍵詞：**東亞 江戶日本 鄭成功 臺灣 歷史書寫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是科技部計畫 106-2628-H-001-002-MY3 和 109-2410-H-001-073-MY3 共同研究成果。

## 一·前言

當此之時，明室既亡，冠帶之國變為左衽，搢紳之士改節易操者滔滔皆是；而成功僅以一彈丸之地，適能抗滿清百萬之兵，竭力明室，始終不渝，忠貞之心，堅如金石，可不謂之忠臣哉！……夫芝龍反覆之徒，固無足道，然妻為烈婦而子為忠臣，忠義貞烈咸萃一門，何其盛也！蓋成功母子雖其忠烈出於天性，亦非我神州風氣之所使然歟？然則鄭氏之有成功，不翅明國之光，亦我神州之華也！<sup>1</sup>

水戶藩儒者青山延于(1776-1843)在為《臺灣鄭氏紀事》(文政十一年[1828]出版)所寫跋文中，將鄭成功(1624-1662)理解為據臺(「彈丸之地」)抗清復明的忠臣，並訴諸儒家價值觀，讚賞其「忠貞之心」。青山不只強調鄭成功是忠於「明室」的「忠臣」，且認為其「忠貞之心」應源自母親，因其母乃「忠義貞烈」的日本「烈婦」。因此，青山稱鄭成功母子「忠烈出於天性」，應是「神州」(日本——筆者按)風氣使然。該書序文作者林述齋(1768-1841)也強調鄭成功不僅具「忠肝義膽」，「亦猶吾民」。<sup>2</sup>其實，此種看法常見於江戶後期和明治時期的鄭成功書寫，本文要討論的《臺灣鄭氏紀事》即是此種看法所需相關史料和論述的主要來源。

然而，就現今歷史研究而言，鄭成功確實抗清，但是否真要復明，則有疑問。<sup>3</sup>如此看來，鄭成功是否可謂「(明室)忠臣」呢？這或見仁見智，或也可

---

<sup>1</sup> 青山延于，〈青山跋〉，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75。本文為便於讀者查閱，基本上使用《臺灣文獻叢刊》的版本，並同時參閱江戶時代出版的《臺灣鄭氏紀事》(水戶：須原屋安次郎，1828；長崎：長崎大學附屬圖書館經濟學部分館武藤文庫藏)。但筆者另外看到的蓬左文庫和國會圖書館所藏版本皆未有出版說明。又，1828版的青山所寫跋文記為〈臺灣紀事跋〉。

<sup>2</sup> 林述齋(林衡)，〈林序〉，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1。

<sup>3</sup> 林田芳雄，《鄭氏台灣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實紀》(東京：汲古書院，2004)，頁62。對此問題，吳正龍則認為「鄭成功並非全然忠於明朝，其奉永曆正朔，僅是維持一種形式上的象徵意義」，參吳正龍，《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182。鄭維中也指出：「即使他(鄭成功)公開宣稱以反清復明為終極目標。實際上，他想要的不過是保留自身在福建的權力」，並認為鄭成功「目標是要如同朝鮮一般，被承認為藩屬國君王」。鄭維中著，蔡耀緯譯，《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新北：衛城出版社，2021)，頁334-336。

分不同時期來理解。<sup>4</sup> 又，我們也可問鄭成功忠心的對象是「君」（明室），還是「國」（還有，是哪一國）呢？這其實也端看我們如何解釋。但是，不論鄭成功復明的決心有多強，其擊敗荷蘭人，在臺灣正式建立漢人政權一事，無疑具有巨大世界史意義，<sup>5</sup> 鄭氏海商集團在全球貿易史上的意義也相當值得探討。<sup>6</sup>

但真實鄭氏政權（鄭氏海商集團）與臺灣早期歷史為何是一回事，在《臺灣鄭氏紀事》與其相關著作中，有關鄭氏政權和臺灣早期歷史書寫及在其修辭基礎上所建構的「歷史」（即人們對這一段過去歷史的記憶與敘事），又是另一回事。<sup>7</sup> 我們生活在歷史記憶所構成的世界，而歷史記憶的建構則依據某些相關文本和相應的社會情境。<sup>8</sup> 從這種觀點來看，我們會發現順治朝文獻多稱鄭成功為「海逆」、「閩逆」、「海孽」等，將之視為叛亂者。<sup>9</sup> 在乾隆朝，鄭成功則被置於《逆臣傳》<sup>10</sup> 中，在清朝編修的地方志也未受太多注意。<sup>11</sup> 然鄭成功卻在清末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後來，他也成為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所需的民族英雄，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反帝國主義和解放臺灣所歌頌的民族英雄。<sup>12</sup> 這些皆是在新現實社會情境中，歷史記憶被重新建構的結果。

然吾人必須注意的是，有關鄭成功形象與記憶在清末中國的重構，乃至相關研究的展開，實際上與日本的鄭成功形象和相關文本有所關聯。日本的鄭成功論述和文本也相當複雜多元，可大分為以近松門左衛門 (1653-1725) 所編《國性爺合戰》為主的文學、戲劇文本系統，及以《臺灣鄭氏紀事》為主的歷史文本系

---

<sup>4</sup> Xing Ha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1620–17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78-87.

<sup>5</sup> Tonio Andrade,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sup>6</sup> 鄭維中，《海上傭兵》；Ha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sup>7</sup>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出版社，2015），頁13。

<sup>8</sup>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頁12-16。

<sup>9</sup> 佟國器，〈福建巡撫佟國器密奏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甲編》（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1931），第6本，頁545；佟代，〈浙閩總督佟代揭帖〉，《明清史料甲編》第6本，頁549；張學聖，〈福建巡撫張學聖題本〉，《明清史料甲編》第3本，頁296等。

<sup>10</sup> 鄭成功事蹟記述在〈鄭芝龍傳〉，國史館編，《逆臣傳》（出版地不詳：國史館，1932），卷四，頁14-24。

<sup>11</sup> 吳正龍，《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頁237-238。

<sup>12</sup> 吳正龍，《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頁2。

統。過去相關研究主要關注、依據《國性爺合戰》系統。<sup>13</sup> 相對之，本文擬在東亞漢文圈知識史視野中，闡明《臺灣鄭氏紀事》系統相關文本的編纂、關聯與其效應，並從這個角度來探究清末中國的鄭成功書寫。<sup>14</sup>

### （一）《國性爺合戰》與《臺灣鄭氏紀事》

為何我們必須關注《臺灣鄭氏紀事》呢？首先，《國性爺合戰》等文學與戲劇文本比較接近庶民生活意識，**和文脈**性質濃厚。相較之，川口長孺（綠野，1772-1835）所寫的《臺灣割據志》<sup>15</sup> 和《臺灣鄭氏紀事》等漢文文本（及**漢文脈**<sup>16</sup> 性質濃厚的訓讀文文本等），則是正式歷史著作，也是具漢文教養的江戶後期和明治知識人理解鄭成功和臺灣歷史時主要的參考著作。因以漢文書寫之故，其相關著作對清末中國的知識人來說，也比較容易閱讀、理解。

其次，在《國性爺合戰》中，主角「和藤內」（鄭成功）被詮釋為日本神祇保護的打虎英雄，並從神國和神道思想角度詮釋鄭成功和日本的聯結。<sup>17</sup> 在後世

---

<sup>13</sup> 關於鄭成功英雄形象的建構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乃至與日本的關聯等等，已有許多研究，參閱 Ral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7)；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 (2000)：119-125；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三民書局，2006）；藍弘岳，〈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鄭成功、江戶文藝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治〉，《思想》（臺北）41 (2020)：157-201 等。另外，近年中國大陸出版的高致華，〈鄭成功信仰〉（合肥：黃山書社，2006），第三、六章；董灝智，〈江戶—明治文學家對「鄭成功形象」的日本化建構——兼論中日視野下「鄭成功形象」的變遷〉，《文學評論》2019.6：107-114；寇淑婷、曹順慶，〈日本的鄭成功形象建構及其對臺灣的文化殖民〉，《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3 (2021)：162-170 等書籍論文也討論此一問題。這些研究皆以《國性爺合戰》為主，討論鄭成功在日本的形象問題。

<sup>14</sup> 江仁傑，〈解構鄭成功〉（頁 51-52）；張崑將，〈從東亞視域看鄭成功形象的「中華」意識之爭〉（《深圳社會科學》2020.2：53-54）等有注意到《臺灣鄭氏紀事》對江戶日本鄭成功形象的影響，但皆未能進一步討論該書與明清中國史書的關係，及該書對江戶後期其他鄭成功歷史書寫相關著作的影響。

<sup>15</sup> 本文使用版本為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同時參照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收藏寫本。

<sup>16</sup> 關於「漢文脈」和「和文脈」的使用，參藍弘岳，〈「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3.1 (2022)：216-217。

<sup>17</sup> 藍弘岳，〈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頁 166-176。

文藝與歷史書寫的交互作用中，《國姓爺合戰》會對鄭成功之日本英雄形象的塑造有所作用，有助形成鄭成功乃日本人的社會認知。如《國姓爺忠義傳》和《繪本國姓爺忠義傳》除受儒學影響，強調鄭成功之忠義形象外，也吸收了《國姓爺合戰》的情節。<sup>18</sup>

但是，鄭成功之所以在江戶時代被賦予明朝忠臣形象，與《國姓爺合戰》並無太大關聯。《國姓爺合戰》中鄭成功（「和藤內」）的形象應是：在海外活躍並受日本神祇保護的武勇日本人。而且，該劇日本特色濃厚、虛構色彩強，實際上對清末中國之鄭成功形象建構不容易有影響。相較之，隨著江戶後期漢學（儒學）發展，及西方勢力迫近，<sup>19</sup> 曾揚名海外的鄭成功也開始受到江戶知識人重視，除在《國姓爺忠義傳》等小說外，在漢詩文和歷史書寫等領域，也從其日本身分和重視忠義價值的儒學角度詮釋其行動與意義。《臺灣鄭氏紀事》就是在此脈絡下出現的代表作品。因此，在明治時期聯結鄭成功與日本的臺灣統治，及日本文本對清末中國鄭成功書寫的影響方面，《臺灣鄭氏紀事》及其影響下的相關漢文文本應更重要。

## （二）《臺灣鄭氏紀事》與《臺灣割據志》

必須一提的是，用漢文書寫的《臺灣鄭氏紀事》與其前身《臺灣割據志》也因引用許多相關禁書史料，及收入許多日本史料的關係，具重要史料意義。如後述，《臺灣鄭氏紀事》是促使南明史學開創者朱希祖（1879-1944）於民國初年開始研究鄭氏臺灣史的重要著作。其次，一九五〇年代《臺灣文獻叢刊》將這兩書收入其中，奠定鄭氏家族研究的重要基礎。在此脈絡下，我們也必須釐清兩書差異和其編纂過程，及其在鄭成功和臺灣歷史書寫中扮演的角色與意義。

《臺灣鄭氏紀事》與其前身《臺灣割據志》雖非文學文本，但同樣受傳統漢文歷史書寫的文本結構與思惟制約，也有許多歷史敘事情節和曖昧不明的漢字語詞等，可提供讀者歷史想像空間。其內容差異已有人指出，如下：

---

<sup>18</sup> 《國姓爺忠義傳》於一七一七年出版，又名《通俗國姓爺忠義傳》。《繪本國姓爺忠義傳》，前編由石田玉山（法橋玉山）作畫與編寫，完成於一八〇四年；後編則由石田玉山作畫，山珪士信編寫，刊行於一八三四年。藍弘岳，〈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頁 165-166, 178-180, 190。

<sup>19</sup> 關於江戶後期儒學者的海外認識問題，參真壁仁，《德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昌平坂學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變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學，2007）。

異者則割據志以我國紀元為主、下附日本紀元，鄭氏紀事改以日本紀元為主、下附我國紀元。此外，如割據志述及臺灣風土與先住民習俗，又述及康熙末年朱一貴之亂；而本書皆未見。再，割據志敘事蕪雜之處，本書亦多去繁就簡。至若朱之瑜（舜水）事蹟，割據志未詳載而本書則增益之。因此，我們推測：**割據志當為鄭氏紀事之底稿，亦即鄭氏紀事乃就割據志加以增損而成者也。**<sup>20</sup>

此一理解大抵無誤。然而，此兩種版本間，尚有其他差異。

就筆者現今掌握的資料，井坂清信《江戶時代後期の水戸藩儒——その活動の点描——》為最完整處理《臺灣割據志》及《臺灣鄭氏紀事》之著作。<sup>21</sup> 井坂在該書第五章〈川口綠野著《臺灣鄭氏紀事》刊行始末〉中，討論水戶藩儒川口長孺所寫的這兩本書。井坂指出，川口以明清中國為「中土」，並以明代年號為首的歷史記述方式，被藤田東湖（1806-1855）、小宮山楓軒（1764-1840）等人指正，因之改訂為更具日本中心意識的歷史記述方式。從上述修正，可知《臺灣鄭氏紀事》不同於一般在明清中國生產的史書，乃明顯具日本中心國家意識的鄭氏政權（主要是鄭成功）和臺灣的歷史書寫。但井坂並未在其研究基礎上，再深入探究《臺灣鄭氏紀事》在水戶藩史學中的位置與意義，及《臺灣鄭氏紀事》編纂過程中，明清中國所生產關於鄭氏家族和臺灣史文本，在江戶日本的脈絡（context，本文中有時使用語境、情境）中，如何被閱讀、轉譯和重新詮釋的問題。本文將對上述兩個問題展開研究，以論證水戶藩儒者如何吸取、轉化在中國中心華夷秩序觀念下所生產的明清中國著作（包括許多禁書），從而建構具有日本中心華夷秩序觀念的鄭氏政權和臺灣歷史書寫的過程與意義。

其次，本文也將探究《臺灣鄭氏紀事》與江戶後期乃至明治時期鄭成功和相關人物書寫的關聯，及該書對臺灣的歷史書寫所產生的效應。在此問題意識脈絡下，本文擬探究的是：鄭成功與日本的聯結，特別是其日本人母親與弟弟如何逐漸受到關注與討論，及《臺灣鄭氏紀事》與明治時期出現的「臺灣舊領」（臺灣是日本舊有領土）論述之關聯。<sup>22</sup> 此外，如前述，本文也將探究江戶時代

<sup>20</sup> 周憲文，〈後記〉，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 77-78。

<sup>21</sup> 井坂清信，《江戶時代後期の水戸藩儒——その活動の点描——》（東京：汲古書院，2013）。

<sup>22</sup> 「臺灣舊領」論述或可說屬於江戶時代就已出現的臺灣領有論之一環，但又不同於日本當積極領有臺灣的論述；而是主要透過對於「倭寇」（「日本邊民」）和鄭氏政權的歷史想像，進而產生臺灣本屬日本的認知與論述。在相關研究方面，見松永正義，〈台湾領有論

以來有關鄭成功和臺灣的歷史書寫，又如何清末中國的脈絡中被利用、重新詮釋。

總之，本文擬在東亞知識史、思想史乃至全球史視野中，釐清鄭成功與臺灣歷史相關文本、知識從明清中國到日本，再從日本至清末中國的翻譯與傳播過程，以論述東亞漢文圈內部知識流動的特質，及《臺灣鄭氏紀事》這一文本的意義與重要性。

## 二·《臺灣割據志》的編纂與明清中國書籍

### (一)《大日本史》與《臺灣割據志》

無庸置疑，水戶藩史學以《大日本史》的編纂為核心展開。《大日本史》以紀傳體編纂，從明曆三年（1657）創設史局，到明治三十九年（1906）完成紀、傳、志、表三百九十七卷，已歷經數次改訂。<sup>23</sup>《大日本史》在〈列傳〉部分有「外國傳」（卷二三二～二四三），但其所謂「外國」，主要指涉與日本歷代政權有交涉的朝鮮半島，及亞洲東半部大陸上國家（主要是中國歷代王朝）。有意思的是，明治本的「外國傳」被改為「諸蕃傳」，以更顯明的日本中心華夷秩序觀念看待其周邊國家。<sup>24</sup>

值得注意的是，《大日本史》中的世界地理觀念，本無臺灣。因《大日本史》乃從上古日本講述至南北朝，而臺灣則在南北朝之後，才逐漸受到日本人關注。特別是日本對於鄭氏政權的關注，使他們注意到臺灣，而鄭氏政權則聯結了日本、中國和臺灣的歷史。因此，川口長孺的著作草稿先被命名為《臺灣割據志》，但實際內容是講鄭成功家族的歷史。其間也有變更為《臺灣紀事》、《臺

---

の系譜》，氏著，《台湾を考えるむずかしさ》（東京：研文出版社，2008）。但該文並未觸及江戶時代的臺灣歷史書寫方面的問題。另外，大浜郁子在〈内藤耻叟における日本の台湾領有論〉（《沖繩文化研究》29[2003]：409-434）中，討論活躍於明治時期的水戶學者内藤耻叟提出臺灣本屬於日本所統治「屬地」的觀點，並檢討該觀點如何影響伊沢修二對臺灣的認識。但該文未進一步探究其他明治時期出現的臺灣是日本固有「屬地」論述，及這些論述與《臺灣鄭氏紀事》的關聯。

<sup>23</sup> 參閱勢田道生，〈《大日本史》写本卷首目錄の対照：柳沢文庫蔵本・酒井家文庫蔵本による〉，《詞林》54（2013）：41-63；勢田道生，〈津久井尚重《南朝編年記略》における《大日本史》受容〉，《近世文藝》98（2013）：31-44。

<sup>24</sup> 勢田道生，〈《大日本史》写本卷首目錄の対照〉，頁42。

灣志》、《臺灣別志》等書名的想法出現，最後則定為《臺灣鄭氏紀事》。<sup>25</sup>《臺灣割據志》處理的對象，雖非由《大日本史》既有的「外國傳」直接衍生，但必然會受《大日本史》的日本中心華夷秩序觀念影響。

## （二）《臺灣割據志》與川口長孺，及其時代背景

《臺灣割據志》作者川口長孺在任彰考館總裁時，受水戶藩第八代藩主德川齊脩 (1797-1829) 之命，開始編修以鄭成功事蹟為主的明末清初歷史，但該書的出版並不順利，經過一些波折後，才於文政十一年 (1828)，以《臺灣鄭氏紀事》之名出版。<sup>26</sup> 青山延于說：「故我公嘗獲成功書，愛其筆畫適逸類其為人，展翫不置，乃命同僚川口長孺纂其事蹟。」<sup>27</sup> 青山所謂「成功書」並不清楚指的是哪封書信，但可知德川齊脩獲得鄭成功真跡，應就是水戶藩編纂該書的主要契機。但這應只是表面原因。德川齊脩指派川口撰寫有關鄭成功的歷史，可能跟川口對海防及日本與周邊國家間歷史地理之深厚知識有關。<sup>28</sup> 除《臺灣鄭氏紀事》外，川口另著有《海防微言》<sup>29</sup> 和《征韓偉略》<sup>30</sup> 等書籍。

《臺灣鄭氏紀事》出版於文政十一年，當時雖依然是鎖國時期，但從十八世紀後期開始，俄羅斯人便來到北海道，要求位於南端的松前藩通商。日本社會從那時起便開始有知識人關心、研究俄羅斯。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中期，日本真正開國之前，因為俄羅斯本非其「通商」「通信」之國（唐山、朝鮮、琉球、紅毛），故面對如何處理俄羅斯人的通商要求時，除以「鎖國」祖法觀念拒其貿易要求外，其實也已出現主張「開國」的言論。<sup>31</sup> 總之，十八世紀末，俄羅斯來到日本要求通商一事，高度引起江戶日本知識人的注意和各種政策討論，川口也是其中一人。<sup>32</sup> 其《海防微言》是在此背景下寫出的。川口在該書中，稱述島津氏

<sup>25</sup> 井坂清信，《江戶時代後期の水戸藩儒》，頁 395-397。

<sup>26</sup> 井坂清信，《江戶時代後期の水戸藩儒》，頁 377-385。

<sup>27</sup> 青山延于，〈青山跋〉，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 75。

<sup>28</sup> 川口長孺，《綠野園集稿本》（自筆稿本，東京：國會圖書館藏），卷三，〈蝦夷全圖序〉。

<sup>29</sup> 川口長孺，《海防微言》（寫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sup>30</sup> 川口長孺，《征韓偉略》（大阪：河內屋茂兵衛，1831；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sup>31</sup> 藤田覚，《近世後期政治史と対外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頁 3-78。

<sup>32</sup> 川口長孺，《綠野園集稿本》卷三，〈蝦夷全圖序〉。

攻琉球，及濱田彌兵衛（生卒年不詳）征伐荷蘭等過往日本的豐功偉業，並認為因泰平日久，以致「北虜」（俄羅斯）跋扈。<sup>33</sup>《臺灣割據志》（及其後的《臺灣鄭氏紀事》）之所以寫於一八二〇年代，應也與此國際背景有關。也就是說，在「北虜」跋扈的刺激下，濱田彌兵衛和鄭成功等過去在日本南方海洋發展的英雄歷史開始受到關注。也是在這一脈絡中，江戶後期的日本開始出現積極的海外擴張論，且如島津齊彬（1809-1858）、山田方谷（1805-1877）、吉田松陰（1830-1859）等人已將臺灣視為擴張對象，主張應將臺灣納入其勢力範圍。<sup>34</sup>《臺灣鄭氏紀事》創作於此時代背景下，恐非偶然。

### （三）《臺灣割據志》前的鄭氏政權相關文本

以鄭成功為主題的文學、戲劇而言，早在《臺灣割據志》編纂之前，已有《明清鬪記》（1661）和《國姓爺合戰》（1715）等相關文藝著作在日本出版、演出。<sup>35</sup>另外，清人鄭亦鄒（生卒年不詳）以史書體例書寫的《鄭成功傳》也傳至日本。留在臺灣的該書抄本底頁識語中有：「亦鄒，康熙時人，目擊其事，故能詳言之，凡一萬三千餘字，乾隆丙申（四十一年）以後奉禁，書坊不敢藏板，無處可購。」<sup>36</sup>可見該書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成為禁書，但在日本卻得以出版。《鄭成功傳》應屬《明季遂志錄》的一部分（《島上坵傳》），而《明季遂志錄》確實在禁書目錄上。<sup>37</sup>

據該書序文，《鄭成功傳》（該書封面書名為《國姓爺傳》，裏頁則為《白麓藏書鄭成功傳》，以下稱《鄭成功傳》）的確取自《明季遂志錄》，<sup>38</sup>由木村兼葭堂（1736-1802）進行校對後，在「浪花」（大阪）出版。上卷由金龍道人（1712-1782）在明和八年（1771）作序，下卷則由芥煥彦章（1710-1785）在安永二年（1773）作序。該書可謂是第一本在日本出版有關鄭成功的正式史書。從此書

<sup>33</sup> 川口長孺，《海防微言》。

<sup>34</sup> 藍弘岳，〈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文化研究》14（2012）：280-287；松永正義，〈台灣領有論の系譜〉，頁252-256。

<sup>35</sup> 藍弘岳，〈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頁157-201。

<sup>36</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上卷，頁736。

<sup>37</sup> 姚觀元編，《清代禁毀書目四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484。

<sup>38</sup> 金龍道人，〈刻鄭成功傳叙〉，鄭亦鄒，《鄭成功傳》（浪花〔大阪〕：河內屋茂兵衛，1771-1773；刊本，名古屋：蓬左文庫藏），上，頁1。

藍弘岳

的出版，可知日本知識人大抵是在十八世紀後期才真正開始關注鄭成功。在序文中鄭成功除對比於楠木正成 (?-1336) 外，<sup>39</sup> 也被視為「我日東之國」揚名於「西夏」（中國）的人物。<sup>40</sup> 這兩點在後來的鄭成功歷史書寫中不斷被強調。但如青山延于所說：「清人嘗為成功傳，頗多遺漏」，<sup>41</sup> 故有《臺灣割據志》的編纂。

#### (四) 《臺灣割據志》引用書目略析

首先，讓我們看看《臺灣割據志》引用了哪些書籍。其原本的編列順序如下：<sup>42</sup>

- 《明史》（清 張廷玉等撰）
- 《明史叢》（清 王鴻緒）
- 《明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筆者按〕》（明 谷應泰）
- 《明紀編年》（明 鍾惺）
- 《明季遺聞》（清 鄒漪流〔鄒漪——筆者按〕）
- 《明季遺聞評》（明 張斐）
- 《中興實錄》（明 馮夢龍）
- 《三藩紀事本末》（清 楊陸榮）
- 《閩書》（明 何喬遠）
- 《兩朝從信錄》（明 況國元〔沈國元——筆者按〕）
- 《三朝實錄》（清 希福等）
- 《臺灣紀略》（清 林謙光。以下四部《說鈴》所收）
- 《臺灣雜記》（清 季麒光）
- 《談往》（〔《花村談往》——筆者按〕，清人匿名，稱花村看行侍者）
- 《畫壁詩》（清 范承謨）
- 《平臺紀略》（清 藍鼎元。以下四部《龍成〔威——筆者按〕秘書》所收）

<sup>39</sup> 金龍道人，〈刻鄭成功傳叙〉，鄭亦鄒，《鄭成功傳》上，頁2。

<sup>40</sup> 芥煥彥章，〈序〉（無題名），鄭亦鄒，《鄭成功傳》下，頁1。

<sup>41</sup> 青山延于，〈青山跋〉，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75。

<sup>42</sup> 這裏所列書目按內閣文庫所收藏的《臺灣割據志》寫本中的順序，因《臺灣文獻叢刊》所收刊本有些錯誤。又《臺灣割據志》為寫本，故無頁碼。又，如（清 張廷玉等撰）等等在該寫本中為（清張廷玉等撰），即「清」與「張廷玉等撰」間無空格。本文為方便讀者理解，故空一格，以下同。

- 《外國竹枝詞》（清 尤侗）  
《名家詩人小傳》（清 鄭方坤）  
《蓮坡詩話》（清 查為仁）  
《行在陽秋》（明人施氏失名。以下七部《八家集》所收）  
《粵游紀聞》（明 瞿共美）  
《求野錄》（明人匿名，稱客溪樵隱）  
《也是錄》（明人匿名，稱桐山樵隱冥鴻氏元益）  
《吳三桂傳》（以下三傳清人某稱外史氏）  
《尚之信傳》  
《耿精忠傳》  
《鄭成功傳》（清 鄭亦鄒）  
《武經開宗》（明 黃獻臣）  
《武備志》（明 茅元儀）  
《紀效新書》（明 戚繼光）  
《池北偶談》（清 王士禛）  
《香祖筆記》（同）  
《西湖志》（清 李衛）  
《潛確類書》（明 陳仁錫）  
《綏寇末刻編》（作者未考。以下三部《寄園寄所寄》所收）  
《兩朝識小錄》（同）  
《菊泉集》（同）  
《舜水文集》（明 朱之瑜）  
《西河合集》（清 毛奇齡）  
《郡國利病書》（明 顧炎武）  
《武德大成》（〔《武德大成記》——筆者按〕，日本 林慈等）  
《武德編年集成》（日本 木村高敦）  
《和漢合運》（日本 釋圓智並吉田光由）  
《國史》（日本 澀井孝德）  
《逸史》（日本 中井積善）  
《華夷變態》（日本 林恕）  
《外國異聞》（日本 水藩所纂）

藍弘岳

- 《明季文字》（同）  
《南龍公言行錄》（日本 紀藩人某）  
《義公行實》（日本 水藩安積覺等）  
《南塾乘》（日本 林恕）  
《鳩巢小說》（日本 室直清）  
《外國通信事略》（日本 源君美）  
《采覽異言》（同）  
《長崎夜話草》（日本 西川正休〔西川如見之子——筆者按〕）  
《華夷通商考》（日本 西川如見）  
《東里新談》（日本人失名。立原萬〔立原翠軒——筆者按〕曰氏金子東里為號）  
《明清閩記》（日本 前園噌武，本姓徐氏，父明人）  
《臺灣軍談》（日本 庸明失姓氏〔該書作者為上坂兼勝——筆者按〕）

上述引用書目總計有五十九部書。其中，按其分類，屬明朝人（包括南明政權）所編書籍有十六部，屬清朝人所編寫的書有二十四部，日本人所編寫之書則有十九部。

這份書單有一大特色：**就是幾乎不參照《臺灣府志》等清代出版的地方志，反而多引明末清初時期出版的著作，其中大多為清代禁書。**<sup>43</sup> 如王汎森所指出的，清代文獻多出現「自我壓抑」的現象，在編纂地方志時相當常見，特別是乾隆以後的方志，在涉及明代史實時，往往會照抄官書。<sup>44</sup> 不知川口長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多深，他雖常引《明史》，但幾不引其他清代官方著作。反之，他多引清代禁書。除上述《鄭成功傳》外，其他如《明紀事本末》、《明紀編年》、《明季遺聞》、《中興實錄》、《三藩紀事本末》、《兩朝從信錄》、《武備志》、《潛確類書》等等皆是。<sup>45</sup> 除此之外，明清中國所出版的叢書《寄園寄所寄》（收三部書《綏寇末刻編》、《兩朝識小錄》、《菊泉集》）本身就是禁

<sup>43</sup> 但在《臺灣鄭氏紀事》中有加引《臺灣縣志》（頁72）。

<sup>44</sup>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433。

<sup>45</sup> 《明紀編年》、《明季遺聞》、《三藩紀事本末》、《兩朝從信錄》、《武備志》、《潛確類書》，參閱姚觀元，《清代禁毀書目四種》，頁411, 422, 438, 455-456；《明史紀事本末》，參王彬主編，《清代禁書總述》（北京：中國書店，1999），頁307；《中興實錄》，參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172。

書。<sup>46</sup>《八家集》是流傳日本的傳寫本，收錄內容都是明清易代方面的著作，<sup>47</sup>其中至少《粵游紀聞》、《也是錄》收在清代禁書目錄。<sup>48</sup>

另外，我們也可注意到川口長孺多引《武經開宗》、《武備志》、《紀效新書》等明代兵書。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應與江戶武士政權重視兵學教育有關，使他注意到同屬明末中國出版書籍的《武經開宗》中有鄭芝龍（1604-1661）傳記。<sup>49</sup>川口在書寫鄭芝龍相關歷史時，引該傳記十四次左右。<sup>50</sup>其中，更直接引該書一段文字後，曰：「其說在芝龍未降清之前，而頗寓規箴。」<sup>51</sup>川口似乎特別看重偏明代立場的書籍，對清代官方編纂書籍有相當的不信任感。

其他如明遺民張斐（1635-1687）所寫的《明季遺聞評》，及朱之瑜（1600-1682）的《舜水文集》雖沒有出現在禁書目錄，但以清代禁書標準來說，也應都算是禁書。總之，川口所引用的明清書籍中，應超過一半屬清代禁書，或無法在清代中國出版之作。順便一提，川口所引書目中，雖無被認為是「最古的臺灣實地考察報告」，現已是討論明代中國臺灣認識的重要史料——〈東番記〉，<sup>52</sup>然〈東番記〉已收入何喬遠（1558-1632）的《閩書》。<sup>53</sup>因此，川口實際上透過《閩書》，使用〈東番記〉。

如上，川口多引明末清初中國出版的書籍（包括明遺民著作），其中許多文本成為清代禁書。這使得他的著作帶著某種同情明朝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從整個東亞知識史來說，他多引用這些書籍，除他自己能更客觀書寫活躍於明末清初時期的鄭氏家族歷史外，也因之，清末中國知識人能透過其書寫內容與使用文獻，重新接觸這些有關鄭氏家族的歷史記述資料。

<sup>46</sup> 王彬，《清代禁書總述》，頁 218。

<sup>47</sup> 《八家集》收七部書，包括《行在陽秋》、《粵游紀聞》、《求野錄》、《也是錄》、《吳三桂傳》、《尚之信傳》、《耿精忠傳》。其中後三部收在《四王合傳》，以《四王合傳》之名收在《八家集》。參閱長澤規矩也，〈解題〉，《和刻本明清資料集 第二集》（東京：汲古書院，1974），頁 1。

<sup>48</sup> 王彬，《清代禁書總述》，頁 503, 537。

<sup>49</sup> 黃獻臣，《武經開宗》（出版地不詳：芙蓉館，1636），卷九，頁 67-68。

<sup>50</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 5, 8-11, 14, 34, 54-55。關於川口引《武經開宗》的重要性，感謝編委會的提醒。

<sup>51</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 55。

<sup>52</sup>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頁 137。

<sup>53</sup> 陳第，〈東番記〉（見何喬遠編撰，《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卷一四六，〈島夷志〉），但內容有些異同（方豪，〈陳第東番記考證〉，《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總經銷，1969〕，頁 868-876）。相關內容見於《閩書》第 5 冊，頁 4359-4361。

藍弘岳

其次，《臺灣割據志》多引用江戶日本出版的書籍。川口所引的日本書籍來源相當多元，有《武德編年集成》等史料集、《逸史》等私人史論，及《長崎夜話草》等隨筆類著作，乃至如《明清鬪記》、《臺灣軍談》等文學類作品。這些著作勢必會使其鄭成功書寫更具日本特色，更強調鄭成功與日本的關聯。但如《國性爺合戰》等相關文本，可能因其虛構色彩強烈，故不被列為參考資料。

再從另一方面來說，川口沒有參照《從征實錄》《閩海紀要》《海上聞見錄》《臺灣外記》等現今鄭成功實證研究重視之原始史料。《從征實錄》《閩海紀要》《海上聞見錄》在清代時，只有手傳抄本，或無傳來日本。<sup>54</sup> 相較之，江日昇（生卒年不詳）《臺灣外記》（求無不獲齋刊，康熙五十二年[1713]）在康熙年間已出版，應在川口開始撰寫時就傳來日本。然或因其小說性質濃厚，而未能被採用。總體來說，《臺灣割據志》使用的資料來源多元，但如何調和這些著作，並從日本本位的觀點進行論述，便是川口必須苦心思慮的問題。

### 三·《臺灣割據志》內容概略：以牛皮換地歷史敘事為中心

首先，川口長孺從說明臺灣地名的變化開始敘述，即從「北港」、「東番」到「塔伽沙谷（たかさご）」、「東寧」乃至「臺灣」。<sup>55</sup> 之後，川口簡單介紹臺灣的地理環境、周邊海洋情況、氣候與中土的差異，及農作物的收成情況。然後，他以「土番」為臺灣先住民，明末時漳州人和泉州人為後來者的方式展開敘述，並論及鄭和（1371-1433）曾到臺灣，及海寇林道乾（生卒年不詳）作亂的歷史。

#### （一）「倭」、「倭寇」與「日本」

在此脈絡下，川口說：

嘉靖、萬曆間，奸民誘日本邊民悍謫者，令侵略明地，明人稱之倭寇（閩書）。道乾，所謂倭寇之黨也（明史）。初臺民悉居海濱，遭倭寇焚掠，土悉殘破，乃避居山後（明史、閩書）。日本長於鳥銃，番獨特鏢，故不

<sup>54</sup> 《從征實錄》在一九三一年由史語所出版後，才廣為人知。朱希祖在該書序文有說明當時舊抄本的破爛狀況（〈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頁1）。故理所當然，川口不可能知道該史料。關於此點，感謝編委會告知。

<sup>55</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1。

能敵（閩書）。琉球遣使，言日本有取臺灣之議；以其地密邇福建，詔警備沿海。中國漁舟嘗飄至臺地，遂往來通販（明史）。後番人漸通中國，及漳泉人徙居，往往譯番語貿易，以瑪瑙、瓷器、銅簪、環類易其鹿脯、皮等（閩書）。紅毛嘗泊舟，因事耕鑿設閘閘（明史）。日本或據北線尾，出沒為沿海患（臺灣紀略）。時南海盜起，海澄人顏振泉為魁。<sup>56</sup>

川口將林道乾理解為「倭寇之黨」，敘述他們襲擊臺灣原住民之事，及福建漳泉人徙居來臺之事。然後，他開始敘述顏振泉（顏思齊，1586-1625）稱「日本甲螺」，率眾佔臺灣地，及鄭芝龍繼承其位成為該黨之魁，搶掠中國沿海州縣，並受明朝朝廷招撫後幫忙勦賊的過程。

這一段話主要據《明史》、《閩書》及《臺灣紀略》的記述內容。《明史》記載：

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繼光敗之。倭遁居於此，其黨林道乾從之。已，道乾懼為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浚泥，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而雞籠遭倭焚掠，國遂殘破。初悉居海濱，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魁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至萬曆末，紅毛番泊舟於此，因事耕鑿，設閘閘，稱臺灣焉。<sup>57</sup>

其中「遭倭焚掠」應抄自《閩書》卷一四六〈島夷志〉中關於「東番夷人」的記載：「嘉靖末遭倭焚掠，乃避居山。倭鳥銃長技，東番獨持鏢，故弗格」（源於陳第〈東番記〉）。<sup>58</sup> 另外，《臺灣紀略》(1685) 則有以下記載：

先是，北線尾日本番來此搭寮經商，盜賊出沒於其間，為沿海之患。後紅毛（乃荷蘭種）由咖囉吧來，假其地於日本，遂奄為己有。<sup>59</sup>

關於明代中國對於臺灣的認識，已有許多學者從各方面進行探究。<sup>60</sup> 我們可以注

<sup>56</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4。

<sup>57</sup> 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列傳·外國四·雞籠〉，頁8377。

<sup>58</sup> 何喬遠，《閩書》卷一四六，〈島夷志〉，頁4631。

<sup>59</sup> 林謙光，《臺灣紀略》（收入《澎湖臺灣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0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53。

<sup>60</sup> 這個問題，周婉窈在《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1-188，已有專文討論。其他如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方豪《臺灣早期史綱》（頁53-162）、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等書中都有相關的討論。又如後述，岩生成一等人也有相關研究。

意到在明代中國史料中言及日本人或日本相關事物時，雖有些會直言「日本」，但更多情況則使用「倭」乃至「倭寇」一詞。其間差異為何，頗值得探究。

所謂「倭寇」是個複雜且廣受討論的問題。按現今研究，前述《明史》引文中所謂的「倭寇」主要指稱林道乾和林鳳等，在閩粵地區以中國人為主的海寇集團，因其集團中會僱傭一些日本人衝鋒陷陣，故以「倭寇」稱之，但日本人大抵不多。<sup>61</sup> 若我們只以此意義理解「倭寇」，將發現其與日本的關係薄弱。相對之，如〈東番記〉中，陳第曰：「南倭北虜，皆有文字，類鳥跡古篆，意其初有達人制之耶。」<sup>62</sup> 其所謂「倭」在指稱上明顯表示和中國為不同文化的族群，此意義的「倭」或可說接近於「日本」。

然而，在倭寇的相關領域研究中，「倭」與「日本」的異同也是個論爭的問題。但大抵而言，「日本」被認為是指涉代表日本之政治、文化中心的正式名稱；「倭」則指涉日本之邊緣、或非正式名稱、一種源於華夷意識的他稱等。<sup>63</sup> 然後，單就「倭寇」等名稱來說，該詞主要是在中國和朝鮮文獻上使用的他稱，尚有「倭賊」、「倭奴」、「倭夷」等語詞，且就其實際情況來說，也有「真倭」、「假倭」、「裝倭」等的差別。<sup>64</sup> 反過來，襲擊明代中國的海賊集團中，也有日本人偽裝成中國人的「偽華」等。<sup>65</sup> 總之，所謂「倭寇」，就其內容來說，各式各樣的情況都有，《臺灣割據志》中所謂「奸民誘日本邊民悍譎者」是其中一種可能情況。

從上述討論，可知「倭」（「倭寇」）具負面且曖昧的語意，非日本人自稱之詞；相較之下，「日本」和「日本人」則具正面且清楚指涉某一國家政體，及

---

<sup>61</sup> 徐曉望，〈早期臺灣秘史：論晚明海寇林道乾在臺灣的活動〉，《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3.1 (2021)：5-34。

<sup>62</sup> 陳第，〈東番記〉，沈海容輯，《閩海贈言》（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27。

<sup>63</sup> 村井章介從超越民族、國籍（脫國家）的視角來理解「倭寇」，主張「倭」（「倭人」、「倭寇」）是相對於農民，在「環中國海地域」跨境活動的一群人，即「邊緣人（マージナル・マン）」（《中世倭人伝》〔東京：岩波書店，1993〕，頁34-58）。然此說法受到李領等人批評。李領主張「日本」是正式名稱；「倭」則是具負面意義的非正式名稱，但兩者指涉同一實體（《倭寇と日麗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頁224）。

<sup>64</sup> 石原道博，《倭寇》（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頁67-110。

<sup>65</sup> 石原道博，《倭寇》，頁105-106。另參閱太田弘毅，《倭寇——商業・軍事史的研究》（横浜：春風社，2002），頁35-69。

隸屬某一國家人民之意。從這個角度來說，「倭寇」、「倭」和「日本」這些語彙間，其指涉的意義具有相通之處，但「日本」才是具正面意涵且指涉國家等政治統合體的語詞。故川口在《臺灣割據志》中，將中國史料中有些使用「倭」字的部分改為「日本」或「日本人」，如「倭鳥銃長技」改寫為「日本長於鳥銃」，「日本番」則改為「日本」。即川口從日本主體視角，改掉這些具有明顯中國中心華夷意識下所使用的「倭」和「番」等字。至於「倭寇」，川口則詮釋為「奸民誘日本邊民悍譎者」，即中國的「奸民」和「日本邊民」所組成的海寇之黨。但重要的是，在川口書寫的文本中，來到臺灣的「倭寇」（或「倭」）皆被理解為「日本」這個國家實體所延伸出來的勢力，儘管他清楚知道「倭寇」中也有中國的「奸民」。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日本史家如何使用中國史料進行歷史書寫，如川口長孺更改既有資料的「倭」為「日本」或「日本人」。這顯示出他們在特定用語上難以直接引用，而是必須經過適度的改寫。

## （二）「紅毛來借地于日本人」

之後，川口論述明末時期李自成（1606-1645）攻入北京，崇禎皇帝（1611-1644）自縊，清兵入關，南明政權成立與滅亡的經過，及鄭芝龍和鄭成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接著，川口敘述鄭成功與其部下甘輝（?-1659）等人一起展開抵抗並企圖攻克南京，但兵敗南京，轉而將其勢力移到臺灣，且驅逐荷蘭人的過程。

上述這些內容大抵見於明清史書中。有意思的是，川口在說明何以荷蘭人佔據臺灣時，寫了以下一段文字：

先是，芝龍去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而紅毛來借地于日本人，不可，給曰：「願假之纔牛皮大，千金不惜」。許之；紅夷乃絲剪牛皮而連綿，規畫城地里許，曰：「是一牛之皮也」；遂據臺地（鄭成功傳。清尤侗外國竹枝詞詠呂宋曰：「當年失國一牛皮，何處天生金豆枝」。自註曰：「佛郎機以黃金求地如牛皮大蓋屋，王許之，乃剪牛皮相續為四圍，求地稱此，築城居之，遂滅呂宋」。其事與荷蘭奪臺灣相類，蓋彼此傳聞之異耳）。與日本人約，歲分輸鹿皮三萬（香祖筆記）。紅毛築安平、赤嵌二城（鄭成功傳），以夾板船為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皆畏，聽其約束（香祖筆記）。<sup>66</sup>

<sup>66</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53。

## 藍弘岳

這裏的重點在於，鄭芝龍離開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海上」，且「日本人」先於荷蘭人「據臺」。牛皮換地的主角是日本人，且是日本人與荷蘭人進行鹿皮交易後，荷蘭人才佔據臺灣土地並建築城堡。按其所據的《香祖筆記》（王士禎寫於 1702-1704）有下一段文字：

天啟改元，有顏思齊者，為日本國甲螺（猶頭目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芝龍附之，始建平安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遂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而歲輸鹿皮三萬。<sup>67</sup>

《鄭成功傳》則曰：

嘉靖末年……道乾既逸，顏思齊勾倭屯聚，**芝龍附之，未久而去**。荷蘭人遭風飄此，**借地於倭**……<sup>68</sup>

這兩本書清楚說明荷蘭「借地於倭」，及與「倭」約定而「盡有臺灣之地」。可知川口所論並非自創，而是根據明清中國的書籍《鄭成功傳》和《香祖筆記》，只是川口改由日本中心視角進行論述，將具負面意義的「倭」改為「日本人」。

另一重點是，川口說：「芝龍去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海上」。按日本漢文的理解方式「去」當讀為「去る」（離開的意思），即意指鄭芝龍**離開**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於海上。事實上，這句話應是對《鄭成功傳》中「……芝龍附之，未久而去」這句話的詮釋。《鄭成功傳》原文語意比較曖昧，但經川口的轉譯後，對日本人而言，已明顯表達出芝龍離開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海上的先後順序，從而創造出鄭芝龍離開臺灣後，乃由日本人佔據臺灣的想像空間。

這裏有一個問題是，在上述史料中，雖顏思齊被理解為「日本國甲螺」，但從如「引倭酋……」、「顏思齊勾倭屯聚」和「閩人鄭芝龍」等表述語句，可知顏思齊和鄭芝龍等人不同於其前的林道乾，不被理解為「倭寇」。在此脈絡下，如「芝龍去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海上」所表述的，鄭芝龍海商集團有別於「日本邊民」。實際上，鄭芝龍乃至鄭成功所帶領的海商集團，在性質上與所謂的「倭寇」有類似之處，但除與明朝政權有關係外，也更加國際化，並更加壯大。特別是在鄭成功之後，鄭氏海商集團已然具國家形態。故鄭氏一族並不能與「倭寇」直接畫上等號。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臺灣原為「日本人」所據的這一論斷與知名的牛

<sup>67</sup> 王士禎，《香祖筆記》（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清史資料彙刊》子部第 15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卷一，頁 470。

<sup>68</sup> 鄭亦鄒，《鄭成功傳》上，頁 24。

皮換地故事有關。事實上，伊能嘉矩 (1867-1925) 在《臺灣文化志》已指出牛皮換地之說附會於迦太基 (Carthage) 建國神話，而不具史實價值。<sup>69</sup> 但該故事的敘事情節不斷地被套用，藉以解釋歐洲人如何霸佔原生居民土地的過程。

記載臺灣牛皮換地故事的史料，最早出現於蔣毓英 (生卒年不詳) 於康熙二十五年 (1686) 所編的《臺灣府志》。<sup>70</sup> 其曰：

天啟元年，又有漢人顏思齊為東洋日本甲螺，引倭彝屯聚于臺，鄭芝龍附之。未幾，紅彝荷蘭人由西洋而來，願借倭彝之地暫為棲止，誘約一牛皮地即可。倭彝許之，紅彝將牛皮剪如繩縷，周圍圍匝已有數十丈地，久假不歸，日繁月熾，無何而鵲巢鳩居矣。尋與倭約：「若舍此地，每年願貢鹿皮三萬張。」倭乃以地悉歸荷蘭。<sup>71</sup>

所謂「倭彝」、「紅彝」即指「倭夷」和「紅夷」。<sup>72</sup> 在上述《香祖筆記》的版本中表述為「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其中「酋歸一王」或本是「夷」字，所謂「歸一王」應指荷蘭人長官揆一 (Frederick Coyett)，不知為何混入該句中。<sup>73</sup> 或可能是「歸一王」(揆一) 被誤認為是「倭酋」之名。

<sup>69</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上卷，頁 59-60。即在西元前九世紀，腓尼基人泰爾 (Tyre) 王國的狄多 (Dido) 公主逃到北非突尼西亞，向當地部落首領求借一張牛皮之地，然後她便把一張牛皮切為一條一條細絲，再將之連接起來，並圍出一大塊地皮，建立迦太基城。該神話其後在西洋文學中廣為流傳、使用，形成一種模式化的歷史敘事情節。關於該故事的進一步介紹，及其與亞洲、臺灣的關聯，可參閱龔纓晏，《求知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254-271。

<sup>70</sup> 黃美娥，〈點校說明〉，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 1 冊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頁 113。

<sup>71</sup> 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 1 冊)，頁 127。另外，在《臺灣文獻叢刊》第 310 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 也收錄該書。順便一提，于雅樂 (Camille Imbault-Huart) 著，郭維雄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據某中國史家之說，引荷蘭人向日本人以牛皮借地的故事，以說明荷蘭人最初如何在臺灣落腳經營 (頁 19-20)。那應是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中的這段內容。

<sup>72</sup> 清朝書籍許多涉及夷、狄等字皆被改。按《東華錄》所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之諭，指示「夷」改為「彝」。參閱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頁 113。

<sup>73</sup> 王士禛，《香祖筆記》記載：「荷蘭國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頁 470)，句中「歸一王」指荷蘭人長官揆一 (Frederick Coyett)，兩者發音接近，事蹟也符合。感謝編委會提醒。川口在《臺灣割據志》也指出「按歸一王，紅化酋也，事詳見于下，筆記蓋傳聞之訛，故不採焉」(頁 4-5)。

《臺灣府志》以具華夷觀念的歷史書寫方式，將「倭」書寫為「倭彝」（「倭夷」）。這是一個清廷的漢人官員敘述來自西洋「紅夷」如何在臺灣騙了東洋「倭夷」的故事。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行的高拱乾等人編纂《臺灣府志》<sup>74</sup>及康熙五十七年（1718）刊行周元文等人編纂《重修臺灣府志》依然是這一版本。<sup>75</sup>

有意思的是，這個故事在不斷傳承的過程中，內容也隨之發生變化。如在乾隆七年（1742）刊印的劉良璧等人編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其內容如下：

天啟元年，漢人顏思齊為東洋國甲螺（東洋，即今日本；甲螺，即頭目之類），引倭屯於臺，鄭芝龍附之；尋棄去。久之，荷蘭紅毛舟遭颶風飄此。愛其地，借居於土番；不可，乃給之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許之。紅毛剪牛皮如縷，周圍圍匝已數十丈；因築臺灣城（即安平鎮城）居之。<sup>76</sup>

在這個版本中，荷蘭人借地的對象不是「倭」（「倭夷」、「日本人」），而是「土番」！實際上，不同於前述版本，「劉志大半摭拾『通志』」，<sup>77</sup>即劉良璧編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在體例上仿郝玉麟、謝道承於乾隆二年（1737）編纂的《（乾隆）福建通志》，然在《（乾隆）福建通志》記載中，荷蘭人訂約的對象依然是「倭」。<sup>78</sup>若然，劉良璧等人編纂《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應是最早將之改為「借居於土番」，但尚不知此書的敘述是否取自別處，也不知其動機為何。

這樣的敘事情節顯然比較符合當時清代臺灣的社會情境，故《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便成為後世理解此一故事的主要版本。如刊於乾隆十八年（1753）的《臺

<sup>74</sup> 高拱乾纂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3。

<sup>75</sup> 周元文纂修，《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3。

<sup>76</sup> 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39-40。

<sup>77</sup> 范成纂修，《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序〉，頁 13。

<sup>78</sup> 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乾隆）福建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7-5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二，頁 61。

海見聞錄》、<sup>79</sup>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刊印的《重修鳳山縣志》、<sup>80</sup> 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刊行的余文儀編纂《續修臺灣府志》，乃至連橫《臺灣通史》<sup>81</sup> 皆是如此。

相較之下，鄭亦鄒《鄭成功傳》敘述方式較接近原始版本。在鄭亦鄒的記述中，牛皮換地的主角分別是「倭」與「荷蘭人」，沒有「土番」介入。鄭亦鄒《鄭成功傳》正是川口撰寫《臺灣割據志》時主要的參考書籍，川口據此書所述，將故事中的主角改稱為「日本人」與「紅毛」。同樣重要的是，《臺灣割據志》也據《香祖筆記》，說：「（荷蘭人——筆者按）與日本人約，歲分輸鹿皮三萬」，以強化荷蘭人是與日本人進行貿易，從而奪取臺灣土地的意象。即在《臺灣割據志》中，與荷蘭人牛皮換地和鹿皮貿易的對象皆是「日本人」。

就現今歷史研究來說，早在十六世紀後期就有日本人來到臺灣，在荷蘭人統治臺灣之前，日本人已在臺灣與中國人等進行走私貿易。而且，豐臣秀吉 (1537-1598) 也曾欲派部下帶其親筆信招諭臺灣。德川家康 (1542-1616) 時代則開始朱印船貿易，有日本船來到臺灣。當時村山等安 (?-1619) 帶著朱印狀遠征臺灣，但並沒有成功。近代學者再加上日文和西班牙、荷蘭的史料，更進一步確認在荷蘭人來臺之前，有一部分日本人已居住在北線尾一帶，與中國人等進行貿易。<sup>82</sup> 一部分日本人先荷蘭人來臺經商、居住這一事實並不同於日本國家權力已進入臺灣。但若當時日本國家權力願意進一步支持日本海商，則日本可能早已成功佔領臺灣。<sup>83</sup> 不過，我們都知道日本後來將東亞的海洋留給歐洲人與中國的海商。

回到漢文文本內容來看，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荷蘭人「借地於倭」這樣的記述內容？按荷蘭人的記錄《巴達維亞城日誌》，他們有以十五匹綿花布 (cangan)

<sup>79</sup>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9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5。

<sup>80</sup> 王瑛曾纂修，《重修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6。

<sup>81</sup> 連橫，《臺灣通史》（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13。

<sup>82</sup> 岩生成一，〈豐臣秀吉の臺灣征伐計畫について〉，《史學雜誌》38.8 (1927)：750-763；岩生成一，〈豐臣秀吉の臺灣島招諭計畫〉，《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7 (1942)：75-118；岩生成一，〈台湾における日本人〉，《続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頁 281-302。

<sup>83</sup> 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

向新港原住民買土地，<sup>84</sup> 也有原住民（西拉雅族）向荷蘭人要求交年租的記錄。<sup>85</sup> 但這些記錄不管是買或租，其對象都是原住民。這比較符合後來的版本。不過，我們也可找得到荷蘭人向日本人收購牧場的相關記錄。<sup>86</sup> 不知這是否與漢文文本中「借地於倭」之說法有關？

雖然實際上荷蘭人應是在一六二四年入臺，在一六二〇年代，除新來的荷蘭人和西拉雅族內部不同的部落勢力外，尚有日本海商，和顏思齊、鄭芝龍等中國海商（主要是閩南商人），各種勢力共存於現今安平及附近的平原一帶。<sup>87</sup> 一直到一六三〇年代中期，日本鎖國，以荷蘭人為首的 Pax Hollandica 才得以確立。<sup>88</sup> 但是《臺灣割據志》中「芝龍去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而紅毛來借地于日本人」這一段話，暗示鄭芝龍集團離開臺灣後，日本人取而代之，佔據臺灣，故荷蘭人才向日本人借地。如後述，後來的江戶與明治時期的日本人讀者大抵如此理解。本來臺灣早期歷史就有許多曖昧不清之處，再加上臺灣歷史相關漢文文本中使用的「倭」（「倭寇」）等語詞語意的多元性、曖昧性，皆給予後世日本人想像的空間。

其次，我們知道荷蘭人佔據臺灣後，濱田彌兵衛來臺貿易，並與荷蘭人發生衝突。《臺灣割據志》也據《國史》、《鳩巢小說》和《長崎夜話草》等書，簡潔敘述了濱田彌兵衛事件始末，且並不特別將之理解為英雄。<sup>89</sup> 而且，有一點要強調的是，在川口的論述中，濱田彌兵衛事件與「牛皮借地」故事並無關係。

讓我們再回到《臺灣割據志》。之後，川口敘述鄭成功不久後便病死於臺灣，至其子鄭經（1642-1681）掌權時的內部權力鬥爭，再論已任清提督的施琅（1621-1696）率兵攻臺，並迫使鄭克塽（1670-1707）投降的過程。其間，川口也大篇幅細論吳三桂（1612-1678）與耿精忠（1644-1682）舉兵抗清的經過。然後，川口也據藍鼎元（1680-1733）的《平臺紀略》，陳述朱一貴之亂。

<sup>84</sup>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ビヤ城日誌 上卷》（東京：日蘭交通史料研究会，1937），頁62。

<sup>85</sup> 江樹生主譯註，《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I 1627-1629》（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頁83。

<sup>86</sup> Salvador Diaz 的口述記錄 “Relação da fortaleza poder e trato com os Chinas, que os Olandesestem na Ilha Formosa dada por Salvador Diaz, natural de Macao, que la esteve cativo e fugio em hua soma em Abril do Anno de 1626,” 轉引自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p. 42.

<sup>87</sup>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pp. 23-62.

<sup>88</sup>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pp. 63-79.

<sup>89</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56。

最後，川口長孺在該書末段表示：「事雖專係鄭氏，傍及華夷之隆替。」據之，可知這本書大抵帶著以明為「華」、清為「夷」的視角敘述鄭氏一族事蹟和臺灣史。但川口畢竟不是明朝人，而是日本人，故其著作相較於其他類似傳記的另一特點就是，花了許多篇幅討論鄭氏家族與日本，及日本與臺灣間的關係。重要的是，雖然《臺灣割據志》已加入許多日本視角的敘述，然在川口的同事看來，其日本色彩依然不足。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他的同事如何批評《臺灣割據志》。

## 四·《臺灣鄭氏紀事》的修正與出版

### (一)《議臺灣別志》中的批評

川口長孺寫完後《臺灣割據志》後，德川齊脩命鶴殿清虛 (1774-1854)、小宮山楓軒、藤田東湖和青山延于幫忙校正。其中，小宮山的校正稿以《議臺灣別志》之名，現存於日本國會圖書館。<sup>90</sup>

據該書稿，小宮山有以下幾點重要的批評。

1. 批評「以明國為本為內，我日本為外為末之書法」。例如：小宮山認為《臺灣割據志》中，「臺灣古荒服」、「日本人稱之塔伽沙谷」、「清朝復舊為臺灣」等說法，皆是以「彼國」（中國——筆者按）為本的筆法，即以中國觀點所進行的歷史書寫。再者，如「官軍莫能抗，朝廷始議招撫」中之「官軍」、「朝廷」等語詞皆以「明朝臣民」的筆法書寫。
2. 與第一點相關，批評以中國為華為中心的語詞、筆法，並建議應以日本為本位進行書寫。小宮山認為如「臺灣氣候與中土殊」這句話中使用的「中土」，實是把「我邦」（日本）視為「夷」的筆法。小宮山建議，稱日本時要改稱「我邦」，即要以日本為中心的視點來進行書寫。
3. 小宮山指出，將日本政治制度上的職稱翻為漢文用語，實過度牽就漢文本既有概念，乃不必要之作為。如川口長孺以「長崎尹」來稱長崎奉行。
4. 指出書中的字句文法錯誤。如「為清兵被擒」當是「為清兵所擒」等。
5. 批評史料的使用問題，如批評他沒有使用朱舜水〈與安東守約〉之書信等。

<sup>90</sup> 小宮山楓軒，《議臺灣別志》（寫本，東京：國會圖書館藏）。又，井坂清信據該資料已寫出〈川口綠野著《臺灣鄭氏紀事》刊行始末〉一文，詳細討論《議臺灣別志》的內容。以下所引皆據該寫本，及井坂的論述。筆者僅據之再進行分析。又因《議臺灣別志》無頁碼，故引文不再一一注釋。

藍弘岳

總的來說，小宮山在《議臺灣別志》中提出了許多修正建議，主要針對歷史書寫的修辭筆法乃至漢文文法的問題，其中特別重視如何書寫日本本位之周邊國家歷史的問題。川口長孺則按其建議，重新補訂《臺灣割據志》，後將書名修正為《臺灣鄭氏紀事》。

## （二）《臺灣鄭氏紀事》的內容修正概略

《臺灣鄭氏紀事》內容基本上與《臺灣割據志》大體相同，但有以下的差異。

### 1. 修辭筆法的差異

首先，川口大抵接受上述《議臺灣別志》的建議，改為以日本為主體的視角敘述。在《臺灣割據志》稱為「日本」之處，在《臺灣鄭氏紀事》則大都改稱為「本邦」或「我……」。如「日本人稱之塔伽沙谷」改為「**我海商**之往貿販其地者，佔據北線尾（臺灣紀略），呼其地為塔伽沙古」，<sup>91</sup>「日本邊民」改稱為「**我邊民**」「**本邦邊民**」。<sup>92</sup>

其次，年號排列也更動為以日本年號為先的順序。例如：《臺灣割據志》「四年辛未（日本寬永八年）、正月、帝……」，在《臺灣鄭氏紀事》改為「（寬永——筆者按）八年辛未（明崇禎四年），正月，明主……」<sup>93</sup>的排列方式等。又如「**官軍**莫能抗，朝廷始議招撫」<sup>94</sup>改為「**明兵**莫能抗，始議招撫」<sup>95</sup>等等。這種修辭筆法的修正，使得全書展現一種以「我」（日本）為本位的明末中國與臺灣歷史書寫。

### 2. 新史料、新內容

其次，《臺灣鄭氏紀事》增加使用許多日本史料，使《臺灣鄭氏紀事》對於鄭氏家族與日本關係的描述更加詳細。對於鄭成功生母，《臺灣割據志》據《談往》、《南塾乘》、《華夷變態》等史料，僅言「時年十八，居肥前平戶，賣履為業。娶其地婦，生成功。及芝龍貴，婦封國夫人。成功生夜，島中萬火齊明，

---

<sup>91</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2。

<sup>92</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3, 48。

<sup>93</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8。

<sup>94</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6。

<sup>95</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4。

芝龍心異之」，<sup>96</sup> 並且附上「芝龍日就島主宴飲歌舞，主室有文君悅之，即成功生母也」（《談往》）、「芝龍娶長崎婦生成功」（《南塾乘》）、「長崎婦，芝龍妾，與成功母異」（《華夷變態》）這幾段話，對鄭成功生母之事存疑，說明不多。<sup>97</sup> 但對於鄭母之死，相較於《鄭成功傳》只云：「母不去，死之」；<sup>98</sup> 《臺灣割據志》據《長崎夜話草》有更多情節的描寫，記下鄭母「登城樓投河水自殺」，及「清兵吐舌曰：『婦女尚爾，倭人之勇可知也。』」等，清人對鄭母和「倭人」的稱讚。<sup>99</sup> 這一段話後來不斷出現在日本人創作的鄭成功相關著作中。

相對之下，《臺灣鄭氏紀事》中，據《新著聞集》、〈田川七左衛門訴狀〉、〈鄭道順訴狀〉、〈執政諭細川光尚書〉等新史料，加上「初，芝龍之居平戶也，娶平戶士人田川氏女，生成功及弟七左衛門」、「七左衛門冒母氏稱田川，田川氏今微而事蹟不詳」等說明。<sup>100</sup> 據此，可得知鄭成功之生母姓氏為「田川」，但其事蹟尚不詳。在此處所引用的〈田川七左衛門訴狀〉及其論述，成為後來相關著作中，將鄭成功之母理解為田川氏的重要依據。<sup>101</sup>

再者，《臺灣鄭氏紀事》在關於留在日本的鄭氏家族方面，加上下述內容：

成功時年七歲（鄭成功傳。按華夷變態曰：「時年十七」；而以成功卒年推之，與此條七歲之文，年紀相合，則變態之說誤矣），七左衛門纔二歲（據七左衛門訴狀「正保乙酉前年年十六」文推而書之）。後芝龍及成功貽書數招母子；母子自平戶詣長崎，然以七左衛門幼，辭而不赴。正保元年甲申，七左衛門年十六。以年漸長，成功強而迎之；芝龍妻謂七左衛門曰：「良人及汝兄數欲相迎，然我憐汝幼，辭之數矣。今汝稍長而不往，恐使汝失父兄之權。今止汝于此，我將從其請詣彼地，請良人託每歲來船

<sup>96</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5。

<sup>97</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5。

<sup>98</sup> 鄭亦鄒，《鄭成功傳》上，頁5。

<sup>99</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26。原文為：「鄭成功ろの母は……城の樓に登りて、自害しつつ下なる大河に落入ってこそ死にけれ。日本女人のありさまかくの如くなれば、男子の武勇おしはかりぬと、韃靼の軍勢みな舌をまきける。」西川正休編，《長崎夜話草》（收入《長崎叢書》第1卷，長崎：長崎市役所，1926），頁42。

<sup>100</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7。

<sup>101</sup> 如林燿（林復齋）編，《通航一覽》（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第5冊在相關史料的注解引用《臺灣鄭氏紀事》（卷二一二，頁391-394）。關於鄭成功之母的研究，〈老一官に嫁した田川氏〉中已多所考察，見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1938），頁160-179。

贈銀以為資給。縱令我身不全，無足顧」。遂請航於幕府，幕府許之。翌年赴明；每歲贈銀于七左衛門。及後芝龍妻死節，七左衛門詣江戶，請赴明戮力成功，減清以報讎；幕府令七左衛門貽書成功達其意。七左衛門數託書于長崎成功船；而成功船人貪縱，頗私財貨，恐七左衛門赴明，或發其事，故不達書。適會嚴有公薨，國哀多事，所志不達，還長崎而歿。子名道順，復姓鄭。七左衛門之請減清報讎也，道順亦欲共父赴明，而事不成。及父歿，正德中來江戶，住吳服街，以醫為業，不仕而終（參取**七左衛門訴狀、鄭道順訴狀**）。<sup>102</sup>

這段敘述主要據〈田川七左衛門訴狀〉〈鄭道順訴狀〉進行書寫，但後來的讀者應大多以《臺灣鄭氏紀事》中的記錄來理解鄭氏家族在日本的情況。<sup>103</sup> 其內容表明鄭成功之弟七左衛門原欲赴明助兄抗清，然來到日本的鄭成功船上之船員偷藏財貨等，因怕七左衛門赴明後，東窗事發，故未傳達書信。七左衛門之子鄭道順也曾欲與其父一起赴明，但也同樣沒有成功，最後住在江戶，行醫為生。其他如清人對鄭母投水自殺行為稱讚之事，《臺灣鄭氏紀事》也依樣記述之。<sup>104</sup>

另一方面，關於乞師日本之事，《臺灣鄭氏紀事》也比《臺灣割據志》說明得更詳細。《臺灣割據志》言及以下五次，包括隆武元年、隆武二年、永曆二年、永曆三年、永曆十二年。<sup>105</sup> 相較之下，《臺灣鄭氏紀事》言及上述五次之外，更利用《舜水文集》，詳加說明在永曆十三年（1659）鄭成功所發動的南京攻略，並提及鄭成功可能透過朱舜水乞兵日本之事。<sup>106</sup> 總體來說，《臺灣鄭氏紀事》增加更多與日本有關的史料及論述。不過，該書也刪除了原本在《臺灣割據志》中記載的濱田彌兵衛事蹟。

<sup>102</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 7-8。

<sup>103</sup> 〈田川七左衛門訴狀〉、〈鄭道順訴狀〉的原始史料似已逸失。目前筆者只知〈田川七左衛門訴狀〉轉引在宮崎來城，《鄭成功》（東京：大學館，1903），頁 241-247（感謝劉序楓教授告知相關史料）外，也刊載在近藤瓶城編，《史料通信叢誌》（東京：史料通信協會，1893-1898），第 14 本，「肥前」，頁 28-34。

<sup>104</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 21。

<sup>105</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 21, 28, 30, 32, 47。關於明末乞師與日本的應對，參小宮木代良，〈「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に対する家光政權の対応—正保三年一月十二日付板倉重宗書狀の検討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史学》97 (1990): 1-19。關於鄭芝龍和鄭成功父子乞兵日本的問題，參石原道博，《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頁 1-75。

<sup>106</sup>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頁 44-46。

上述內容為兩書主要的區別，但如上一節所論的牛皮換地之事及荷蘭人與日本人做鹿皮生意，而佔據臺灣土地並建城的内容等則沒有差異。例如：《臺灣割據志》中「芝龍去臺灣後，日本邊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而紅毛來借地于日本人」在《臺灣鄭氏紀事》只改「日本」為「本邦」。<sup>107</sup> 總之，兩書透過牛皮換地故事，及鄭氏政權相關人物乞師日本等事強化日本與臺灣的聯結。但《臺灣鄭氏紀事》對於鄭氏家族在日事蹟，及鄭成功與朱舜水之關聯則有更多著墨，並採用更凸顯日本本位的立場來敘述。

如前述，《臺灣鄭氏紀事》由隸屬幕府的昌平黌儒者林述齋寫序文，水戶藩江戶彰考館總裁青山延于寫跋文的方式出版，等同獲得當時儒學與歷史編纂界權威的背書。以下討論該書在江戶後期與明治時期的影響。

## 五·面向海洋與「皇國之餘烈」：《臺灣鄭氏紀事》與江戶後期的鄭成功書寫

### (一) 《海外異傳》與《海外異傳匡謬：附國姓爺系圖》

《臺灣鄭氏紀事》出版後廣被利用。首先，昌平黌儒者齋藤拙堂 (1815-1852) 在《海外異傳》(1850 年刊) 中就據該書，說：「方此之時，支那姦民，稱日本甲螺，誘我邦邊民。」<sup>108</sup> 其次，齋藤認為鄭芝龍離開臺灣後，「我邊民代之為甲螺，而紅毛夷來借地，約歲輸鹿皮三萬」，更言及「紅毛夷」自「日本甲螺」奪臺灣據之。<sup>109</sup> 其中，「我邊民」就是《臺灣鄭氏紀事》的用詞。其他諸如其道：「清兵吐舌曰：『婦女尚能爾，倭人勇決不負所聞也』」等事，對鄭成功母親勇敢殉死的描述，也皆依據《臺灣鄭氏紀事》。<sup>110</sup> 但如後述，齋藤採用《賜姓始末》來描寫鄭母自殺之事。總之，齋藤同樣透過鄭母來強調鄭成功與日本的聯結。因此，齋藤說：「鄭大木之王臺灣亦我皇國之餘烈。」<sup>111</sup>

<sup>107</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 48。

<sup>108</sup> 齋藤拙堂，《海外異傳》(出版地不詳：惜陰書屋，1850)，頁 2。關於該書其相關文本，可參閱劉家幸，〈片帆敵愾震四海——日本漢文小說《海外異傳》中英雄書寫的敘事結構〉，《文與哲》33 (2018)：289-324。

<sup>109</sup> 齋藤拙堂，《海外異傳》，頁 5。

<sup>110</sup> 齋藤拙堂，《海外異傳》，頁 9。

<sup>111</sup> 齋藤拙堂，《海外異傳》，頁 1。

其次，齋藤說：「鄭大木慷慨唱義，招類日於虞淵，以孤兵當勃興之敵，百折不撓，有我楠中將之風。及其子孫，奉正統於一隅數十年，亦與楠氏相類矣。蓋孕我東方之精故歟。」<sup>112</sup> 如前述，強調鄭成功之忠義的論調見於《臺灣鄭氏紀事》的序跋文。另外，這類將鄭成功之忠勇乃至其一族對明室之忠心與楠木正成和其家族對日本南朝之忠心進行對比的手法，除早見於《鄭成功傳》和刻本的序文外，也見於齋藤之師古賀侗庵 (1788-1847) 之論。透過鄭成功與楠木正成的對比，使鄭成功形象注入更多日本意象，及日本重層的戰爭記憶。<sup>113</sup>

《海外異傳》在內容上大幅依據《臺灣鄭氏紀事》，並在此基礎上加入鎖國之前，也就是江戶初期活躍於海外的山田長政 (1590-1630) 和濱田彌兵衛的故事，以宣揚日本積極向海外發展的歷史過往。齋藤說：「近歲洋夷陸梁，縱橫於印度、支那之間，莫之能遏焉」，<sup>114</sup> 齋藤因意識到海外危機，藉由敘述鎖國時代以前的故事來激勵日本人向海外發展之志。山田長政、濱田彌兵衛和鄭成功皆是在此種情況下，因而被回憶出來並受到重視的歷史人物。其中，鄭成功因其與中國和臺灣有深刻淵源，故成為後來論述日本與臺灣關係時的主要人物。

在《海外異傳》出版不久後，無名陳人 (小林道隆) 於嘉永五年 (1852) 出版《海外異傳匡謬：附國姓爺系圖》，批評《海外異傳》。無名陳人在該書中，指出《海外異傳》「專據川口氏紀事一書，略鈔其文。又採賜姓始末鄭母自裁一事，纔能成編而已。其紕漏百出，條理錯亂。誤後學也大矣」。<sup>115</sup> 有意思的是，《海外異傳匡謬》實際上大部分內容抄襲自谷三山 (1802-1867) 所著〈海外異傳商榷〉，<sup>116</sup> 〈海外異傳商榷〉又是為回應〈與齋藤有終書〉 (森田節齋 [1811-1868] 寫給齋藤拙堂的一封信) 而寫的。<sup>117</sup> 因森田節齋在寄出前，請谷三山批閱該信。<sup>118</sup>

<sup>112</sup> 齋藤拙堂，《海外異傳》，頁 13。

<sup>113</sup> 藍弘岳，〈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頁 170-181。

<sup>114</sup> 齋藤拙堂，《海外異傳》，頁 14。

<sup>115</sup> 無名陳人，〈序〉，氏著，《海外異傳匡謬：附國姓爺系圖》 (奈良：紅樹書屋，1852)。

<sup>116</sup> 谷三山，〈海外異傳商榷〉，氏著，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編，《三山谷先生遺稿》 (奈良：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1917)。

<sup>117</sup> 森田節齋，〈與齋藤有終書〉，《節齋遺稿》 (奈良：奈良縣宇智郡教育會，1910)，頁 34-38。又，該信草稿名為〈與齋藤督學論其所著海外異傳書〉，收錄在《森田節齋草稿》 (寫本，奈良：奈良縣圖書館藏)。

<sup>118</sup> 三者之間的關係，參閱直井文子，〈齋藤拙堂の『海外異傳』とその匡謬書とについて〉，《斯文》110 (2002)：14-30。

森田在該信中主要批評齋藤據《賜姓始末》書寫鄭母自殺一事的問題。本來，《臺灣鄭氏紀事》記述如下：

清兵之未到泉州，芝豹先至……芝豹兵潰，走安平（明季遺聞、鄭成功傳）。芝龍妻至自本邦，在圍城中歎曰：「遙在異域，事既至此，今惜一死，何面目復見人耶」？登城樓投河水自殺。清兵吐舌曰：「婦女尚爾，倭人之勇可知也」。<sup>119</sup>

在《海外異傳》則改為：

清兵入福州，芝龍退屯安海，為清將所誘欲降附，諸將不從。成功痛哭而諫，芝龍不聽，單騎往降。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污。母歎曰：「何面目復見人耶」！登城樓自殺，投河水。清兵吐舌曰：「婦女尚能爾，倭人勇決不負所聞也」。成功痛恨，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sup>120</sup>

兩者的差異有三處：1.《臺灣鄭氏紀事》認為自殺地點是泉州，《海外異傳》則是安海；2.《臺灣鄭氏紀事》僅說鄭成功母「投河水自殺」，《海外異傳》則強調鄭成功之母自殺前被污；3.《海外異傳》據《賜姓始末》，再加入「成功痛恨，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斂」這一段文字。

森田節齋的批評內容主要是，按《臺灣鄭氏紀事》之文意，鄭母應是「城未陷前自殺」，且「剖其母腹」那段「荒誕不經」，並批評《賜姓始末》傳聞失實處頗多，指出「原書剖字上有依夷法一語」。<sup>121</sup> 其批評目的大抵在於，指出《海外異傳》的記述內容使鄭成功之母受冤，進而擔心若該書被清人所見，不利日本形象。此外，也如《海外異傳匡謬》所言：「其意恐晚死貽本邦之恥」、「夫死一也，不受污而死則人爭稱之，若既被污則不復稱之，此情理之常也」。<sup>122</sup> 因此，我們可知在幕末日本儒者想法中，鄭母定會在受辱前死去，以保有日本人名譽。儘管《海外異傳》中對於鄭母的敘述受到批評，該書的出版明顯標示江戶後期儒者已開始關注與日本相關人物在海外活躍的歷史。

<sup>119</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 20-21。

<sup>120</sup> 齋藤拙堂，《海外異傳》，頁 8-9。

<sup>121</sup> 森田節齋，《與齋藤有終書》，頁 35-36。

<sup>122</sup> 無名陳人，《海外異傳匡謬》，頁 3。

## (二) 〈書臺灣鄭氏紀事後〉與《鄭將軍成功傳》

同為昌平黌儒者的塩谷宕陰 (1809-1867) 則著有〈書臺灣鄭氏紀事後〉一文。<sup>123</sup> 塩谷高度評價《臺灣鄭氏紀事》，認為該書實為「一以揭成功之志，一以增我邦之輝」，並具補「明史之漏」、「成功傳之闕」，乃至具補「大日本史」的意義，即從鄭成功復明之志和其與日本的關聯來評價之。鄭成功與《明史》的關聯無庸置疑，然其與《大日本史》的關聯又當如何理解？或許塩谷將鄭成功視為，是《大日本史》中因重視「大義名分」為天皇家而死之楠木正成精神的繼承人。若從此種角度來理解，《臺灣鄭氏紀事》的鄭成功書寫，則符合《大日本史》史觀。如前所述，鄭與楠木之忠心對象不同，但因同具忠義之心，故在幕末漢詩文中，楠木正成的相關記憶被投射到了鄭成功身上。從而，其母為日本人的鄭成功，再加上楠木精神的投射，故也具補《大日本史》之意義。

其次，任職於平戶藩的朝川善庵 (1781-1849) 也寫出〈鄭將軍成功傳碑〉一文，附錄於《善庵隨筆》，並在嘉永三年 (1850) 由玉巖堂出版為專書《鄭將軍成功傳》。該書內容基本上根據《臺灣鄭氏紀事》進行安排。如稱「我邊民」，言及田川氏和七左衛門事蹟，和鄭成功七歲到中國、鄭母於泉州自殺等的敘述皆是。<sup>124</sup> 但朝川強調為鄭成功作傳的原因在於，鄭成功保「明統於不絕」，故「成功有勇有義，不愧其為日本人」。<sup>125</sup> 即著重鄭成功雖為明朝忠臣，同時也是日本人，重視其為日本人的忠義精神。另外，朝川花大篇幅談鄭成功的南京攻略，與臺灣相關部分雖談得不多，但言及鄭成功使人告知荷蘭人，曰：「臺灣即先人故地，當歸於我」，<sup>126</sup> 即他強調鄭成功收復臺灣一事的意義。

有意思的是，身為平戶藩家臣的朝川善庵所寫的《鄭將軍成功傳》本要用來刻成石碑，但未果。直到朝川善庵去世後，葉山高行 (1796-1864) 刪減並改寫其文，於嘉永五年 (1852) 立「鄭延平王慶誕芳跡」碑。該碑文簡短，文中雖論鄭成功「以恢復為己任」，然主要論鄭芝龍和鄭成功父子與日本的關聯，南京攻略部分大幅刪除，並強調其收復臺灣的功績。<sup>127</sup>

<sup>123</sup> 該文寫於文政十二年，參見塩谷宕陰著，內田周平編，《宕陰臚稿》（東京：谷門精舍，1931），卷二，頁51。

<sup>124</sup> 朝川善庵，《鄭將軍成功傳》（江戸〔東京〕：玉巖堂，1850），頁1-3。

<sup>125</sup> 朝川善庵，《鄭將軍成功傳》，頁12-13。

<sup>126</sup> 這段話也見於《臺灣鄭氏紀事》，但文為「臺灣，吾先人故地；地歸吾」（頁50）。

<sup>127</sup> 〈肥前國平戶千里濱鄭氏遺蹟碑記并銘〉見關口隆正，《臺灣歷史歌》（東京：村田直景，1900）。

總之，從《臺灣鄭氏紀事》到《海外異傳》《海外異傳匡謬》乃至《鄭將軍成功傳》等書，鄭成功活躍於海外的事蹟漸受關注，鄭母的角色也愈發受到重視。因為鄭母的存在確保了鄭成功與日本間血脈上、精神上的聯結。這在後來的鄭成功形象建構方面似乎越形重要。儘管從父系血緣觀念來說，鄭成功算是中國人，但在江戶日本之家（イエ，ie）社會<sup>128</sup>中，父系血緣關係並不特別重要。這或間接有助於日本人強調鄭成功的日本身分。另外，《國性爺合戰》中強烈的「國性爺」日本意象也應或多或少有所作用。但重要的是，在這些江戶後期漢文文本中，我們看到的是，鄭母和鄭成功乃至楠木正成之行動，皆被從儒學道德角度進行詮釋。從而，「忠義」被建構為有如日本人之「天性」、「神州風氣」。

其次，從古賀侗庵、齋藤拙堂到塩谷宕陰皆為幕府昌平黌儒者，皆重視海防、面向海洋，並沿著此脈絡注意到鄭成功。在這些書中，除維持《臺灣鄭氏紀事》中已有的明室忠臣形象，及其忠義心與日本的關聯外，更重視鄭母角色，強化其「皇國之餘烈」的意義。並且，也重新被人們以日本海國英雄角度進行詮釋，鄭成功收復臺灣的功績愈加受到重視。其他如梁川星巖（1789-1858）創作了六首與鄭成功相關的漢詩，其中一首稱其為「英魂」，另一首也言及臺灣。整體來說，這些漢詩也是從忠義和與海洋、臺灣相關的視角來創作的。<sup>129</sup> 正是在漢學興盛和日本開始面向海洋的過程中，鄭成功開始受關注，《臺灣鄭氏紀事》相關文本才於十九世紀前期陸續出版。

## 六·領有臺灣：《臺灣鄭氏紀事》與明治時期臺灣和鄭成功的歷史書寫

### （一）明治時期的「臺灣舊領」論述

《臺灣鄭氏紀事》主要記載鄭成功在日本、中國間如何奮戰的內容。除了鄭芝龍到過臺灣外，鄭成功晚年也來到臺灣，與臺灣歷史發生關聯。在其他幕末和明治日本出版的與臺灣史相關著作中，該書也大量被引用。如在幕末成稿、

<sup>128</sup> 渡辺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頁116-121。

<sup>129</sup> 梁川星巖，《西征集》（收入《星巖集 乙集》，江戶：千鍾房，1841），卷三，頁2-3。關於此資料，感謝編委會告知。又，除此之外，應尚有其他文人的鄭成功詩，相關問題有待後論。

明治出版的飯田忠彥《野史》〈外國傳第八 臺灣〉就大量引用《臺灣鄭氏紀事》。<sup>130</sup> 接下來，筆者將著重於：討論日本在歷史上也一度領有過臺灣的想法和相關論述（即「臺灣舊領」論述），並考察此類論述與《臺灣鄭氏紀事》之間的關聯。

首先，足立栗園（生卒年不詳）在甲午戰爭期間，據《臺灣鄭氏紀事》等書寫出《臺灣志》（1894）。他從地理上的相近，及「倭寇」以臺灣澎湖為據點的歷史，主張「臺灣之地全為我日本人民佔據」。<sup>131</sup> 該書專用一章書寫「倭寇」佔據臺灣的歷史，將「倭寇」理解為「日本國民」、「我邦人」、「我寇民」，並認為荷蘭人是騙取「我寇民」而佔據臺灣的。且該書認為在顏思齊之前，「臺灣地方海上的霸權」也是由「日本邊民」掌控的。<sup>132</sup> 總之，在這本書中，儘管歷史想像成分極強，但臺灣無疑被理解為日本的「舊領」。

其次，秋鹿見橘（1869-1954）在《臺灣史要》（1895）中也設「倭寇侵略の時代」一章談「倭寇」與臺灣的關聯，並在論及顏思齊、鄭芝龍也被稱「日本甲螺」後，說：「甲螺即カシラ、首長之義也。然則可知在此之前，日本人間既有所謂カシラ握本島主權，其由來久矣」，<sup>133</sup> 認為荷蘭人借地的對象也是日本人。<sup>134</sup> 另外，《臺灣事情》（1897）也在「倭寇之根據」一節中，說：「有記錄以來，擔任起首先領有臺灣名譽者是我日本人。」<sup>135</sup>

其次，如丸山正彥（1859-1914）以翻譯《臺灣鄭氏紀事》「芝龍去臺灣後，本邦邊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而紅毛來借地于本邦人」的方式，說：「是より先鄭芝龍臺灣を去りてより、我が日本の流氓は海上に出没し、遞番臺灣に據

---

<sup>130</sup> 飯田忠彥，《野史》（東京：國文社，1881-1882），卷二八九，〈外國傳第八 臺灣〉，頁 22-49。該書繼承《大日本史》在問題意識上所書寫的日本史論，成稿於嘉永初年，參閱大阪毎日新聞社京都支局編，《維新の史蹟》（大阪：星野書店，1939），頁 247-251。

<sup>131</sup> 足立栗園，《臺灣志》（東京：哲學書院，1894），頁 4-6。

<sup>132</sup> 足立栗園，《臺灣志》，頁 19-32。

<sup>133</sup> 原文為：「甲螺即ちカシラ、首長の義なり。然らば則ち是より先き、日本人の間既に所謂カシラありて、本島の主權握りしことは、その由来久しきを知るべし」，引用自：秋鹿見橘，《臺灣史要》（東京：成美堂，1895），頁 20。

<sup>134</sup> 秋鹿見橘，《臺灣史要》，頁 30-31。

<sup>135</sup> 原文為：「記錄ありてより以降、第一に臺灣を領するの名譽を荷ひし者は我日本人なりき」，引用自：松島剛、佐藤宏編，《臺灣事情》（東京：春陽堂，1897），頁 3。

り、殆ど日本の版圖に歸したりき」，<sup>136</sup> 直接導出當時臺灣「殆歸日本版圖」的看法。可見這種想法多見於明治中後期的日本人之論，《臺灣鄭氏紀事》則是其主要論據來源。

更重要的是，這類「臺灣舊領」論述，不僅存於非學院作者著作中，水戶藩儒者藤田東湖弟子並在帝國大學擔任教職的內藤耻叟 (1827-1903) 也據《臺灣鄭氏紀事》，發表類似的言論。內藤耻叟在日本領有臺灣後，於明治二十九年 (1896) 發表〈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的講演。<sup>137</sup> 其所根據理由之一就是《臺灣鄭氏紀事》開頭的這段文字：「臺灣為海中孤島（臺灣紀略），古無聞焉，明人始來往其地。」內藤強調該句經其師東湖之父藤田幽谷 (1774-1826) 之手改訂，然後據之說：

雖無庸置疑長久以來臺灣乃無所屬之國，然明顯其一度**成為我國（「我朝」）屬島**。明人也似以之承認有如與琉球同屬之國。然因明人舊習喜務誇張之國家性格，動不動就幻想虛構，無所忌憚地視我國（「我朝」）為屬國，故當然即使知其現實情況，也不言之。<sup>138</sup>

按其所論，在明代乃至其前，臺灣本是「無所屬之國」。但更重要的是，他主張臺灣一度是日本「所屬」之島。為何內藤會有此種認知呢？這與上述《臺灣割據志》和《臺灣鄭氏紀事》中所記載的日本人與荷蘭人進行鹿皮貿易有關。內藤在寫給伊沢修二 (1851-1917) 的信上說：

臺灣過去乃我日本之地也（插入文省略——筆者按）。外國之書明記有荷

<sup>136</sup> 丸山正彦，《臺灣開創鄭成功》（東京：嵩山房，1895），頁 132。今村榮一，〈朱成功傳〉，原田稔甫編，《今村榮一遺稿》（東京：原田稔甫，1904）中有類似文句。其曰：「抑モ、臺灣ノ地ハ。芝龍等一タビ去リテヨリ。我流氓ノ遞番ニ占據スル所トナリテ。殆ド日本ノ版圖ニ歸シタレドモ。」（頁 129）

<sup>137</sup> 該講演內容，參內藤耻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皇典講究所講演》168 (1896)：21-27。又該講演內容曾整理為一篇短文，名為〈臺灣舊領考〉，《國光》14.2 (1897)：40-41。

<sup>138</sup> 原文為：「臺灣は、舊無所屬の國なりしは論なしと雖も、其一旦我朝の屬島たりしこと明らかにして、明人も既に之を以て、琉球と同屬の國と認めたりしが如し、然れども、明人の舊習は、務て誇張するとを好む國がらなりければ、や々もすれば、我朝をも屬國視するの虚を幻して、憚からざりしほどのこと故に、其現情を知りながらも、之を言はざりしは勿論也。」（內藤耻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頁 22）引文中本有的舊式變體假名已換為新式假名。

蘭以鹿皮六萬枚<sup>139</sup>向日本人借之。即使鄭氏逐荷蘭人入臺灣，依然是日本甲螺舊有之地。這是清楚明白的。<sup>140</sup>

另外，內藤在〈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的講演中說：

然彼顏振泉死，鄭芝龍深入明之內地後，臺灣之地全為日本人所據。邊地士民出沒於海上者常守之不去數年，是我所屬島之明證也。故荷蘭人欲謀據此地者也先向我日本人頭目借地，約之每年徵鹿皮三萬（見《香祖筆記》）。於是，荷蘭人築城開市居住之，以至其以大艦巨砲威嚇土人，以相當少的人數領有全島。此時如荷蘭人所有，然實我所屬之地，納稅借之也。<sup>141</sup>

這段文字基本上是據前述《臺灣鄭氏紀事》「芝龍去臺灣後，本邦邊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而紅毛來借地于本邦人」所論，「我邊民」被詮釋為「邊地士民」、「日本人頭目」等，並得出臺灣本為日本「屬島」的結論。但內藤似乎覺得牛皮換地一事的傳說色彩太強，所以他只強調鹿皮貿易的部分，將之詮釋為荷蘭人向日本人借地納交的稅。其次，內藤認為所謂「日本甲螺」也雖有「支那人」，如顏思齊、鄭芝龍，但主要是日本人，之所以不見日本人名，乃因那些關於臺灣早期歷史的書籍皆中國人所編著之書。<sup>142</sup>這或有詭辯之嫌。然內藤除利用「倭寇」「日本甲螺」等語詞語意的曖昧性，以想像來填滿歷史縫隙之外，在講演中也引用中國人編寫的《靖臺實錄》、《聖武記》、《武備志》等書來佐證。<sup>143</sup>

<sup>139</sup> 「鹿皮六萬枚」應是當時記憶錯誤的結果，他在〈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便說「鹿皮三萬」（頁25）。

<sup>140</sup> 原文為：「臺灣は舊我日本の地なり（支那の版圖に入りしは、鄭氏洛活以來百五十年はかり也）。荷蘭鹿皮六万枚を以て日本人にかりたるは外國の書に明記あり。鄭氏蘭人を逐ふて臺灣に入りたれとも、地は猶日本甲螺の舊有なりしことは明白に御座候。」伊沢修二，〈伊沢修二宛内藤耻叟書簡〉，轉引自大浜郁子，〈「琉球教育」と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日清戦争前後の学務官僚児玉喜八の動向を中心に〉，《沖繩文化研究》28（2002）：373-374。

<sup>141</sup> 原文為：「しかるに彼顏振泉死し、鄭芝龍は深く明の内地に入りしより、臺灣の地は全く日本人の所據となりて、邊地の士民の海上に出没する者常に之を守りて去らざりしこと數年なりしは是我所屬島たりし明證也。故に荷蘭人の此地に據らんと謀る者も、先我日本人の頭目に請ふて地を借り、之と約して年々鹿皮三萬を徵せしこと香祖筆記に見ゆ。是に於て蘭人は城を築き市を開きて之に居住し、其大艦巨砲を以て土人を威嚇し、僅少の人数を以て全島を領するに至る。此時は蘭人の所有の如くなれとも、實は我所屬の地税を納れてかりたる也。」内藤耻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頁24-25。

<sup>142</sup> 内藤耻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頁24。

<sup>143</sup> 内藤耻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頁22-23。

首先，《武備志》〈占度載〉中有如下的記載：

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颼利舶七日可至。漢、魏至唐、宋，不通中國。……又有小琉球，近泉州。閩人言：霽日登鼓山，可望而見。入國朝，未嘗朝貢。或曰，并入琉球。琉球旁，有毗舍那者，島中小夷。鳥語鬼形，袒裸盱眙，殆非人類；不通中國。<sup>144</sup>

內藤據此文，認為島中小夷似指「臺灣の土蕃」，並認為據上引用文，可知明代中國人已知臺灣為「舊來海中一孤島，無所屬之國地」。<sup>145</sup>

其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內藤據魏源（1794-1857）《聖武記》：「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sup>146</sup> 這句話強化己論。<sup>147</sup> 追本溯源，施琅早在攻下臺灣後，就說：「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sup>148</sup> 《清實錄》〈雍正元年八月〉記載：「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考聖略神威，取入版圖。」<sup>149</sup> 清乾隆版《欽定大清一統志》指臺灣：「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明天啟中，為紅毛荷蘭夷人所據，屬於日本。」<sup>150</sup> 魏源據上述史料，於《聖武記》〈康熙重定臺灣記〉中云：「雍正元年，憲皇帝即位，詔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神武遠屆，拓入版圖。』」<sup>151</sup> 這些乾隆朝以前的文獻皆表明：「臺灣自古不屬中國」，甚至說「屬於日本」。這對於主張臺灣是日本「舊領」的日本學者來說，是極有利的史料，尤其是《聖武記》。

《聖武記》自弘化二年（1845）傳入日本。<sup>152</sup> 魏源的《海國圖志》廣被日本人翻譯、閱讀之事為學者所熟知，<sup>153</sup> 但其另一部大著《聖武記》也廣受日本知

<sup>144</sup> 茅元儀輯，鵜子直訓點，《武備志》（大阪：賭春堂，1792），卷二三六，頁7。

<sup>145</sup> 內藤耻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頁22-23。

<sup>146</sup> 魏源，〈康熙戡定臺灣記〉，氏著，《聖武記》（北京：琉璃廠，1844；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卷八，頁11。

<sup>147</sup> 內藤耻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頁22。

<sup>148</sup> 施琅，《靖海紀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3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59。

<sup>149</sup> 《世宗憲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〇，頁189。

<sup>150</sup> 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三三五，頁754。

<sup>151</sup> 魏源，〈康熙重定臺灣記〉，氏著，《聖武記》卷八，頁21。

<sup>152</sup> 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收入《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叢刊》第1冊，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頁195-196。

<sup>153</sup> 源了円，〈幕末・維新时期における「海國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研究》9（1993）：13-25。

## 藍弘岳

識人喜愛。<sup>154</sup> 內藤也應在年輕時已讀過《聖武記》。《海國圖志》和《聖武記》的性質並不同。前者收集有關西洋人進入海洋的情報；後者的記錄重點則為清朝皇帝在亞洲內陸的軍事擴張行動，內容顯示出清朝的擴張版圖集中在亞洲內陸，凸顯其陸地帝國的特色。<sup>155</sup>

魏源在《聖武記》中，除表述「臺灣自古不屬中國」外，也言：

自鄭氏以前，中國人無至其地者，皆生番據之。……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竄據臺灣，為琉球人所逐；天啓中，日本倭逐琉球而踞之，荷蘭紅毛夷求香山、求澎湖于中國而不得。乃以重幣啗倭求臺灣一互市地，旋誘以天主教又逐日本倭而有之。及國初，而為鄭氏所據。<sup>156</sup>

這一段話相當有意思。文中，「倭」寫為「日本倭」，不僅認為「日本倭」曾據臺灣，琉球人也曾據臺灣，後遭「日本倭」驅逐，也言及荷蘭人用錢向「倭」（日本）買臺灣，以為互市地。不知魏源據何書，有此理解，但事實上琉球人並未來臺，丁紹儀（1815-1884）評其論，也說：「琉球但圖自固，未嘗一蒞臺境。」<sup>157</sup> 不管如何，在這一引文中，魏源比前述十七、十八世紀關於牛皮換地故事的版本，更清楚地將「倭」理解為日本人。此理解與內藤等日本人一致，故其論述也有利於內藤申論臺灣嘗為日本所有。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聖武記》論述重點並非主張臺灣屬於日本。恰恰相反，魏源曰：「施琅以為天下東南形勢在海而不在陸，陸之為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認為若清廷棄臺灣，則臺灣必歸荷蘭而引來後患。<sup>158</sup> 所以，魏源從海洋視角讚賞施琅將臺灣納入版圖的主張。魏源所提出的海洋與陸地視角差異的問題相當重要。**正是從海洋視角，臺灣的重要性才會凸顯出來。**如前述，日本知識人在幕末時期已從海洋視角理解到臺灣的重要性，內藤之論也在這一思想史脈絡中。但據筆者所知，內藤耻叟應是，最具體地

---

<sup>154</sup> 《聖武記》版本多，在日本也廣被閱讀，也有許多和刻本。相關問題，參閱神田信夫，〈『聖武記』雜考〉，《東方学会創立四十周年記念 東方学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87），頁 305-320。

<sup>155</sup> 茂木敏夫，〈《海国図志》成立の背景——中国社会の變動と経世論〉，《洋学》19/20（2015）：147-165。

<sup>156</sup> 魏源，〈康熙戡定臺灣記〉，氏著，《聖武記》卷八，頁 11。

<sup>157</sup> 丁紹儀，〈東瀛識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71。

<sup>158</sup> 魏源，〈康熙戡定臺灣記〉，氏著，《聖武記》卷八，頁 19。

試圖論證臺灣曾為日本「屬島」、「舊領」的思想家。大抵來說，乾隆朝前，臺灣被認知為「自古不屬中國」，但在西方國家於十九世紀再度從海上東來後，不論日本或清朝中國皆開始認知到臺灣的重要性，並試圖從過去的歷史找尋臺灣與己國的關聯。

## (二) 「臺灣舊領」論述與殖民地臺灣歷史教育

接著，更重要的是，內藤耻叟將日本曾領有臺灣的歷史告訴伊沢修二，這應影響了伊沢對殖民臺灣的歷史教育構想。伊沢修二對比英、法等歐洲國家對其遠距離的殖民地統治，在明治二十九年的演講中說：

何況臺灣過去是日本人的領土，只是被荷蘭人所欺騙，而被奪取走了。這就歷史上看來，是明顯可知的。且在鄭成功事蹟方面，也是古來有緣故之國。<sup>159</sup>

伊沢認為臺灣曾是「日本人的領土」！而且，他認為在地理上也相連，故可視之為「日本身體」的一部分，主張透過教育將臺灣日本化。<sup>160</sup> 在隔年的講演中，他也說：「即使就其歷史來說，以過去日本甲螺渡航為始，殖民彼國之事有明顯證據。又另一方面，如鄭成功的母親是我國人。」<sup>161</sup> 此處所謂的「日本人」當然不是國籍意義下的日本人，而是前述被荷蘭人騙取土地的「我邊民」、「日本甲螺」，及有日本血緣關係的鄭成功。他們皆被用來證明日本與臺灣歷史關係密切。

就伊沢看來，這些在前主權國家階段中，於海上移動的日本人民或英雄成為證明日本曾領有臺灣的重要人物，必須放入臺灣的歷史教育中，教育臺灣人民。儘管後來在一八九八年成立的公學校教育中並沒有設置歷史這門課程，但試圖聯

---

<sup>159</sup> 原文為：「況や台湾は、昔は日本人の領土であつたものを、和蘭人に欺かれて、取られたものであると云ふことは、歴史にも明なり。又鄭成功の事蹟に於ても、古來縁故ある國である。」伊沢修二，〈国家教育社第六回定会演説〉，信濃教育会編，《伊沢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会，1958），頁592。

<sup>160</sup> 伊沢修二，〈国家教育社第六回定会演説〉，信濃教育会，《伊沢修二選集》，頁592-593。

<sup>161</sup> 原文為：「又是に就ての歴史に致してましても古來日本甲螺の渡航を始として彼の國に殖民したことは歴々証拠のあることなり。又一方鄭成功の如きは我国人を母として生れたものである……」伊沢修二，〈新版國人民教化の方針〉，信濃教育会，《伊沢修二選集》，頁638。

結日本與臺灣的歷史關聯，已是殖民臺灣初期許多日本殖民地官僚或知識人關心之所在。由伊沢的考量可見，過往海國日本的歷史不斷被重新回憶起來並加以重構。

另外，曾來臺任職的漢學者關口隆正 (1856-1926) 在《臺灣歷史歌》也有類似主張。在明治後期流行以歌唱教授地理與歷史的教育法，出版如《日本歷史唱歌》等教科書。其目的當是透過唱歌的身體律動來馴化兒童身體、進行道德教育，前述的伊沢修二正是這一做法的推進者。而《臺灣歷史歌》大抵也是在這個脈絡下編寫而成。然不同於《日本歷史唱歌》，《臺灣歷史歌》沒有附樂譜，且除日文歌詞外，尚有漢文譯文（以七言詩方式譯），在譯文後附有詳細的歌詞內容解說。《臺灣歷史歌》明顯為教育臺灣人所製作之書，書中所展示的臺灣史觀點頗為有意思。

關口主張《今昔物語》中出現的「琉球」就是指臺灣，並將臺灣理解為「大琉球」，而現今的琉球則為「小琉球」，又從日本中心（天皇中心）華夷觀念主張兩者自神代以來就是「我邦」之「屬島」。然而古代航海技術不佳，故東南諸島採任「不治之政治」（「先王之以不治治之法」）。之後，他敘述「唐宋以後八百歲無復東西往來舟」，直到明成祖時，「太監王三寶」（鄭和）才來到臺灣，及日本戰國時《明史》所謂「倭寇」來到臺灣。接著，論述濱田彌兵衛、鄭芝龍、鄭成功等人事蹟，之後再論及臺灣在甲午戰後成為日本版圖，及臺灣人民當奉讀《教育勅語》，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等內容。<sup>162</sup>

關口對於《臺灣歷史歌》的注釋相當仔細，應是閱讀過許多資料後編寫的。至少「鄭延平王慶誕芳跡」碑文確實以〈肥前國平戶千里濱鄭氏遺蹟碑記并銘〉之名附錄在該書中。又如關口說：

鄭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既去，移閩中，日本人亦代之。時水尾天皇元和七年也（明熹宗天啓元年、清太祖天命五年）荷蘭國人來求互市地，弗許，誘以重幣，乃允。以是觀之，當時先領臺灣者，即我國人士，而蘭人次之。<sup>163</sup>

這一段所表現的觀點應源於《臺灣鄭氏紀事》「芝龍去臺灣後，本邦邊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而紅毛來借地于本邦人」，或鄭亦鄒《鄭成功傳》，但與《聖武

<sup>162</sup> 關口隆正，《臺灣歷史歌》，頁 1-12。

<sup>163</sup> 關口隆正，《臺灣歷史歌》，頁 6。

記》也有關係，因「誘以重幣」之敘述方式應首出於《聖武記》。但不管如何，其所謂「新領土是舊封疆」<sup>164</sup>的論點也是種臺灣本屬日本領地的觀點。

至於這種看法到底滲透多深，實有待再探究。然如關口也說：「副島種臣論征臺之事，曰臺灣一島自古為我佔領地，……故征臺灣我非攻而取之，使彼島民再沾皇化耳。」<sup>165</sup>即他主張應讓臺灣人再度沐浴於皇化之中，且舉副島種臣(1828-1905)之言佐證已論。事實上，《副島種臣關係文書》所附貼紙中有「臺灣島在二百多年前乃全國是皇國之屬國（台湾嶋も二百余年前ハ全国皇国之屬国）」。<sup>166</sup>副島在與美國公使對話時，也說：「往昔臺灣為我國所有時……（往昔臺灣を我國にて有し候節は……）。」<sup>167</sup>可見此種觀點早出現在一八七〇年代參與出兵臺灣事件政治家的言論中，只是該種論述應主要盛行於日本領臺初期。<sup>168</sup>

綜上所述，一部分領臺初期的日本政治家、知識人意圖從「倭寇」（「日本邊民」）、「日本甲螺」，及鄭成功相關事蹟來聯結日本與臺灣的關係，將日本對臺的殖民統治理解為「回歸」、「再沾皇化」。這是日本領臺初期同化論出現的思想史背景。此種臺灣是日本「舊領」的看法在明治中期，特別是甲午戰爭期間和日本殖民臺灣之初的著作中，似乎普遍存在。這種看法應是伴隨日本重新面向海洋，及向外擴張的情況下，導致在預計日本可能或已經殖民臺灣的現實情境中，重構記憶的一種結果。

<sup>164</sup> 關口隆正，《臺灣歷史歌》，頁12。

<sup>165</sup> 關口隆正，《臺灣歷史歌》，頁11。

<sup>166</sup> 副島種臣，《副島種臣關係文書》（東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頁41-43。另也參閱張虎，〈副島對清外交の検討——副島外務卿宛て勅旨を素材にして——〉，《明治維新とアジア 明治維新研究》6（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頁33。

<sup>167</sup> 「壬申九月二十三日於外務省外務卿副島種臣米利堅合衆國公使シイデロングへ應接記の内」，外務省調査部編纂，《大日本外交文書 卷七》（東京：日本國際協會，1937），頁5-8。

<sup>168</sup> 一八七〇年代在出兵臺灣後所出版的書籍中，如田代幹夫編，《臺灣軍記》（東京：河內屋文助，1874）雖言荷蘭人買鹿皮的對象是日本人，但不主張臺灣是日本舊領。加藤兵吉著，染崎延房編輯，《臺灣外記》（東京：加藤兵吉，1874）則無言及之，主要敘述鄭成功故事。東條保，《臺灣事略》（東京：小倉萬次郎，1875）也只強調鄭芝龍離開臺灣後，由「我邊民」擔任「甲螺」（上，頁6）。

### (三) 《臺灣鄭氏紀事》與明治日本的鄭成功書寫

然而，過度的歷史想像，當然不是所有參與對臺殖民統治之人皆能認同的。如後藤新平 (1857-1929) 在為《臺灣紀要》所寫的〈序〉中，抱怨日本將臺灣納入版圖後，以臺灣為題的書「汗牛充棟」，然許多是「杜撰粗漏的報告，或據過去舊書所寫之作」。<sup>169</sup> 後藤所謂的「舊書」，指的即是本文論及之江戶後期以來的相關史書。同時在《臺灣紀要》中，臺灣乃日本「舊領」的論述大抵已退燒，對於倭寇在臺活動，只云：「不過是為在支那海的事業，以此地為一時之根據地而已。」<sup>170</sup> 其後，約莫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近代歷史學、人類學方法論所書寫的臺灣史研究開始生產之後，《臺灣鄭氏紀事》的重要性已逐漸被取代。不過就鄭成功研究而言，該書的價值依然重要。明治中期以後，因日本殖民臺灣之故，與鄭成功相關論述大量生產。<sup>171</sup> 但本文特別關注宮崎來城 (1871-1933)《鄭成功》一書，因此書是後述清末中國匪石《鄭成功傳》所引之書，並且多據《臺灣鄭氏紀事》。

首先，宮崎來城以「來城小隱」為署名，在《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三十三回〈鄭成功〉，後由館森鴻 (1862-1942) 代筆，又陸續刊載了三十九回，但後來宮崎來城又在這些連載文章基礎上，於一九〇三年出版《鄭成功》。館森鴻則於一九一三年出版《朱成功》，但這是兩本不同的書。<sup>172</sup> 宮崎所寫的《鄭成功》以明治訓讀文的文體書寫（漢文脈性質濃厚的文體），就其所寫的引用書籍目錄來看，可發現其所據之書，幾乎都是明清中國的漢文書籍，及本文討論過的江戶時代出版的《臺灣鄭氏紀事》和《海外異傳》《鄭將軍成功傳》等漢文書籍。其所據的明清中國相關著作也大都是《臺灣鄭氏紀事》所引之書。<sup>173</sup> 因此，該書依然是在江戶以來的漢文傳統（漢文脈）中來理解、書寫鄭成功。他在文中經常引《臺灣鄭氏紀事》，應以之為主要參照文本進行書寫。<sup>174</sup> 又，宮崎的《鄭成功》中許多引文，他雖無明言，然其實皆《臺灣鄭氏紀事》所引用過的文句，如

<sup>169</sup> 後藤新平，〈序〉，村上玉吉，《臺灣紀要》（東京：警眼社，1899），無頁碼。

<sup>170</sup> 村上玉吉，《臺灣紀要》，頁 12。

<sup>171</sup> 藍弘岳，〈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林以衡，〈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臺灣學研究》9 (2010)：97-122 等等。

<sup>172</sup> 林以衡，〈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頁 113-116。

<sup>173</sup> 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2-3。

<sup>174</sup> 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27, 30, 50, 58, 64, 68, 92, 100-101, 106-110, 127, 134-135, 145, 162, 169-171, 210 等等。

「中國之視夷狄，猶峨冠之視殘履；故資冠於履，則莫不惋忿，淪夏於夷，則孰不感愧？」<sup>175</sup> 這一段鄭經的檄文即是。<sup>176</sup>

但在討論鄭成功母親自殺時，宮崎則批評前述《海外異傳》據《賜姓始末》所展開的論述，認為「烈婦」鄭母即使再慌忙，也不太可能被辱後，才自殺。<sup>177</sup> 另外，宮崎據《史料通信叢誌》等史料，對於鄭氏政權乞師日本也有更多討論。<sup>178</sup> 此外，對於與鄭成功共有日本血緣，且同生於「尚武之國」的田川七左衛門的介紹也更完整，將相關史料直接在書中列出，並感嘆其有「慷慨吞胡羯」之氣概。<sup>179</sup> 要之，該書論及鄭成功與日本關聯的部分，實又更加詳細。

其次，與《臺灣鄭氏紀事》不同的是，宮崎來城注意到在「漢文書」以「紅夷」、「洋夷」等文字稱「西洋諸國」，故關於歐洲歷史的書寫有許多不清楚之處，如鄭成功和荷蘭人關係即是如此。<sup>180</sup> 從這個角度，他正面評價里斯 (Ludwig Riess, 1861-1928)《臺灣島史》的貢獻，並根據《臺灣島史》，對於鄭成功的臺灣攻略也有比較清楚的描述。<sup>181</sup> 但反過來，宮崎批評該書有「西眼東視之弊」，認為其對鄭成功的描寫乃隔靴搔癢，評曰：「要之，西眼從殖民政略和貿易上來觀察，而成功之行完全出於忠孝義烈之餘，焉得其公明正大。」<sup>182</sup> 可見儘管宮崎意識到漢文文本中存在的華夷敘事框架的問題，但對於鄭成功，依然是在漢文傳統中，以儒家重視的忠義道德評價之。

如上述，從《臺灣鄭氏紀事》以後，母弟皆日本人的鄭成功，在相關文本中不斷地被從明室忠臣角度評價之。東洋史家那珂通世 (1851-1908) 也最推薦《臺灣鄭氏紀事》，認為此書所記載的鄭成功事蹟最詳細且公平，並認為日本應注意到鄭成功受南明政權賜國姓朱，故應改稱之為朱成功。<sup>183</sup> 那珂在臺灣教育會內部的演講，討論日本帝國的臺灣教育問題時，又再提起應稱鄭成功為朱成功的問

<sup>175</sup>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 59-60。

<sup>176</sup> 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221-223。

<sup>177</sup> 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90-91。

<sup>178</sup> 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130-148。

<sup>179</sup> 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237-249。

<sup>180</sup> 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185。

<sup>181</sup> 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185-199。

<sup>182</sup> 原文為：「之れを要するに、西眼は常に殖民政略上より、貿易上より視察して、而して成功の行は一に忠孝義烈の餘に出づ、焉んぞ其公明正大を得んや。」宮崎來城，《鄭成功》，頁 199。

<sup>183</sup> 那珂通世，〈臺灣朝鮮滿州史研究の枝折〉，《史學雜誌》11.1 (1900)：56。

題。他一方面強調其明室忠臣的身分，但也說鄭成功「始終為明守苦節，至死不渝，是真大和魂也」。<sup>184</sup> 他特別解釋：「忠君義烈不顧死是我國民人特性，稱之大和魂」，<sup>185</sup> 即那珂認為鄭成功所具「忠君義烈」之心為「我國民人特性」，並以之來稱其「大和魂」，儘管他是明室忠臣。至此，鄭成功已更日本化，他們將鄭成功之忠心收為日本帝國所用，從而希望透過鄭成功，激起臺灣漢人反清復明的歷史記憶，以助臺人反清，進而順從日本帝國的統治。

總之，在那珂通世的論述中，明室「忠臣」鄭成功也因忠君愛國之心和母親為日本人的身分，被認為具「大和魂」（「日本魂」）。往上溯，青山延于不也早說：「蓋成功母子雖其忠烈出於天性，亦非我神州風氣之所使然歟？」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疑問語氣已可改為肯定語氣了。至此，鄭成功的忠心已從強調其忠於「明室」（君）的道德訓戒意義，轉而為近代日本帝國所用。

在這裏，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鄭成功之所以被稱為「大和魂」，是從「忠烈」（忠君義烈）這種儒家道德角度加以肯定，透與楠木正成的對比加以強化，且以日本人特性方式表達的。此形象主要來自漢詩文和漢文歷史書寫文本。這基本上與《國性爺合戰》呈現的在海外活躍之武勇日本人形象還是有落差。然近代日本的鄭成功形象無疑是綜合了「忠烈」與「武勇」兩種形象。後來，隨著日本的南進政策，這一鄭成功形象和鄭氏一族的故事也有新發展契機。因為本來鄭成功乃至其後的鄭氏政權皆有向南發展的企圖，只是未付諸實踐。在寫於大正時期的《國性爺後日物語》中，臺灣被理解為南進的絕好基地，鄭成功也表明欲學豐臣秀吉「雄圖日本屬國於海外」，並「遠征南洋之國，把大明國的領土擴張到海外諸國」。在此語境下，鄭成功被詮釋為帝國主義先驅。在其後，鄭成功更被認為是日本鎖國政策後，唯一具「日本人魂」的海國英雄，其霸氣有如拿破崙，鄭母也被形容為「海國日本女性」的典範。<sup>186</sup>

<sup>184</sup> 那珂通世口述，三屋大五郎譯，〈關臺灣人之說〉，《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3（1904）：4。但那珂通世的原文為「成功は流石母の血を受けて居るからして、清の招きにも父の勧めに應ぜず、日本魂を振り起こし、始終明のために尽くしました」（〈臺灣人に關する意見〉，《臺灣教育會雜誌》23[1904]：6）。參照吳華君，〈那珂通世による「朱成功」顯彰と大日本帝國の構想——「一視同仁」と差別の關係性に対する考察として〉，《年報日本思想史》21（2003）：20。但吳文未論及那珂通世文章其實有日文原文〈臺灣人に關する意見〉，及三屋大五郎譯的〈關臺灣人之說〉兩種。又，除上述兩種外，《臺灣慣習記事》4.2（1904）也有相關筆記記錄。吳文應是引用《臺灣慣習記事》的版本進行論述的。

<sup>185</sup> 那珂通世，〈關臺灣人之說〉，頁4。

<sup>186</sup> 萩原新生，《南海雄飛の人々》（東京：皇國青年教育協會，1942），頁276-277。

後來，在近代日本帝國向南方擴張的過程中，在《海外異傳》中討論的濱田彌兵衛和山田長政等人物事蹟，也更進一步被宣揚。從明治時期開始，濱田彌兵衛和山田長政皆被收錄在各種英雄偉人傳記，成為代表日本的海國英雄。<sup>187</sup> 其中，山田長政更是從明治時期開始便受到諸多的研究與討論。<sup>188</sup>

## 七·清末中國的鄭成功書寫與《臺灣鄭氏紀事》相關文本

清末中國的臺灣史相關著作已累積不少，但對於清末的鄭成功論述來說，我們必須思考其與《臺灣鄭氏紀事》及其後日本所生產的鄭成功相關文本的關聯。

### （一）一八七〇年代的《申報》

我們知道在清末時期，鄭成功的逆賊形象已開始轉變。如一八七四年沈葆楨(1820-1879) 在臺灣建造「延平郡王祠」，由清朝政府賜諡號「忠節」。<sup>189</sup> 這應是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政府開始認知到臺灣重要性後的一種政策反應。其後，鄭成功在臺灣相關祭祀活動正式獲得官方認可，並有許多文人以之為題，書寫詩文。<sup>190</sup>

同年在《申報》有一篇言及鄭成功的文章，不解為何日人寫詩弔之，作者說：

殊不知康熙間江日昇《臺灣外志》言：成功之父芝龍誘姦東女翁氏始生成功，與其魁顏思齊於前明天啟四年陰結黨羽謀踞東土為東人所覺，遂星夜潛遁入臺。是成功雖忠於明，其父乃東國姦徒叛黨。東人讀書無多，尚欲追弔成功，認為彼所自出。豈不貽人笑柄！<sup>191</sup>

該名作者認為日本人將鄭成功視為自己人是可笑的，因為按《臺灣外志》（《臺灣外記》——筆者按），對日本而言，鄭芝龍其實是「姦徒叛黨」，故其子鄭成

<sup>187</sup> 丸田猷彦，《冒險遠征傑士伝》（東京：大倉書店，1892）；松本愛重，《少年叢書 本朝立志談 初篇》（東京：少年園，1890）；佐藤治郎吉編，《少年寶庫 日本男児》（東京：東京堂，1891）等等。

<sup>188</sup> 森貞次郎，《山田長政暹羅偉蹟》（東京：春陽堂，1887）；關口隆正，《山田長政伝：附牛山復讐録》（静岡：著草深十丈書屋，1892）。

<sup>189</sup> 毛一波，〈清廷對鄭成功的賜葬建祠和追諡〉，《臺灣文獻》12.1 (1961)：32-36。

<sup>190</sup> 高致華，《鄭成功信仰》，頁42-45。

<sup>191</sup> 青蘋果數據中心「申報 (1872-1949) 資料庫」，〈接續辯謬杞憂生述征番稿〉，《申報》第726期 (1874.09.09，讀取2022.05.20)。

功實不值日本人重視。這應是過度據《臺灣外記》來理解明末史事，及當時中國知識人重視父系血緣觀念的結果，以致完全無法理解日本人何以視鄭成功為自己人的知識脈絡。又，《申報》於一八七八年已出版《臺灣外紀》（《臺灣外記》——筆者按），<sup>192</sup> 該書應是清末知識人理解鄭成功乃至臺灣歷史的主要來源之一，但對於鄭氏家族與日本關係的內容比較不完整，且不同於《臺灣鄭氏紀事》以後日本的相關文本。

總體來說，在一八七〇年代，雖然清朝也開始重新認知到鄭成功的重要性，有與之相關的詩文創作，但看不到太多的討論。應是一九〇〇年代以後，對於鄭成功的討論才大量增加。即在大量中國知識人赴日，開始吸收日本出版書籍的知識之後。如我們也可發現丸山正彥《臺灣開創鄭成功》於一九〇三年被譯為漢文。<sup>193</sup> 而且，海外留學生刊物《浙江潮》在一九〇三年開始分期連載匪石（陳匪石，1884-1959）所寫的〈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後於一九〇四年集結出版為《鄭成功傳》。在該書中，鄭成功成為其國史敘事中的「中國之英雄」。<sup>194</sup> 其他尚有亞盧（柳亞子，1887-1958）所寫的〈鄭成功傳〉，<sup>195</sup> 及光漢（劉師培，1884-1919）〈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sup>196</sup> 等等。如沈松僑所論，清末的排滿民族主義中，鄭成功成為中國的愛國者、民族英雄。<sup>197</sup>

## （二）陳匪石《鄭成功傳》

本文特別注意到的是，陳匪石在撰寫《鄭成功傳》時，大量參照江戶與明治時期的鄭成功相關著作，有丸山正彥《鄭成功》、宮崎來城《鄭成功》、川口長孺《臺灣鄭氏記事》、朝陽（川——筆者按）善庵《鄭成功傳碑》、飯田忠彥《日本野史臺灣傳》、坪井信長（譯）《臺灣記事》、齋藤拙堂《海外異傳》、伊能嘉矩《日本臺灣誌》、吉岡藤吉（譯）《臺灣島史》、秋鹿見橘《臺灣史

---

<sup>192</sup> 青蘋果數據中心「申報 (1872-1949) 資料庫」，〈新書出售〉，《申報》第 1809 期 (1878.03.21，讀取 2022.05.20)。

<sup>193</sup> 丸山正彥著，張鑄六譯述，《臺灣開創鄭成功》（東京：四素寄廬，1903）。

<sup>194</sup> 匪石，《鄭成功傳》（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65-66。

<sup>195</sup> 亞盧，〈鄭成功傳〉，《江蘇》4 (1903)：61-71。

<sup>196</sup> 光漢，〈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中國白話報》20 (1904)：7-14；光漢，〈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續）〉，《中國白話報》21-24 (1904)：41-58。

<sup>197</sup>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頁 119-125。

要》、江馬達三郎《臺灣史料》、足立栗園《臺灣志》、松島剛、佐藤宏《臺灣事情》、村上玉吉《臺灣紀要》、郁永河《偽鄭記事》（原題《偽鄭逸事》）、江日昇《臺灣外記》（申報館版）、黃澄《泣閩錄》等書。<sup>198</sup> 其中，只有郁永河《偽鄭記事》、江日昇《臺灣外記》、黃澄《泣閩錄》三本為清人著作，其餘皆是日本人所寫之書，大多是本文討論過的書。可見匪石也是在江戶後期以來日本人所寫鄭成功和臺灣史相關著作的基礎上，為鄭成功作傳。

匪石對於鄭成功母、弟的描述，應是據《臺灣鄭氏紀事》或宮崎來城《鄭成功》。因為在其引用書中，這兩本最清楚敘述鄭成功母、弟相關事蹟。但在他筆下，鄭成功雖是「幼稟日本大和魂之薰陶」，同時也是「久受中國國粹學」之人。<sup>199</sup> 他說：

順治三年，左七衛門年十六矣，成功復強請母，氏迺告左七衛門曰：「兒乎！昔兒父及兒兄數相迎，吾憐兒，故不果往。兒今長矣，兒父及兒兄又以書來，不往，吾於兒父及兒兄為無辭，是重吾之戚也。且吾又未能與兒偕。嗚呼！吾終舍兒矣！吾憐兒，兒父及兒兄亦必憐兒，當歲以金若干託商舶寄兒。嗚呼！吾終舍兒矣！雖然，兒勿忘兒父及兒兄，又勿忘今兒母所去之中國。吾行矣！」於是田川氏得與長別離之七歲寧馨兒相聚者一年。<sup>200</sup>

七左衛門既負有歸國復讎之志，徒以船舶未便，飲恨於東海之一隅。……使七左衛門而得歸明佐成功乎，則成功事業或更發達。其死也，或繼其位。春秋大復讎之義，吾且以是徵之。<sup>201</sup>

匪石對於鄭成功母、弟行動的描述充滿悲愴風格，且明顯從清末民族主義，排滿復仇觀點進行敘述。如鄭成功之弟被理解為反清復明的復仇者。他甚至描寫道：「成功母在圍城中而題曰：『余夫非中國人乎！今惜一死，何顏以對中國！』」。<sup>202</sup> 在其筆下，鄭成功的日本母親也是「中國人」，願為「中國」犧牲自己，而這個「中國」當然為漢民族主義意義下的「中國」。可說匪石從漢民族主義意義下的英雄母親角度，來謳歌鄭成功之母。至此，日本文本中原使鄭成功流有日本人血液，且具「大和魂」的英雄之母角色意義已被改寫。

<sup>198</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125-126。

<sup>199</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72。

<sup>200</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73-74。

<sup>201</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106。

<sup>202</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76。

其實，匪石的改寫幅度相當大，文中讓「中國英雄鄭成功」高歌「噫嘻！我所愛之祖國兮！夕陽猶是兮，江山已非！」<sup>203</sup>「嗚呼！不有國、毋甯死」。<sup>204</sup>又稱鄭成功軍隊為「國民軍」，<sup>205</sup>並說：「使我中國民而深審民族之大義，孤抱一寧死勿辱之苦節，則人人可為鄭成功」，<sup>206</sup>即他已從近代民族國家意義的「國」「國民」角度來評價鄭成功，將「明室」之忠臣轉而詮釋為「中國」之忠臣（「英雄」）。在其詮釋中，鄭成功之「忠」的對象已轉移。即不是日本帝國，也不是明朝皇帝，而是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才是忠心對象。正是此一意義的鄭成功吸引了清末知識人的注意。

另外有意思的是，匪石也在對鄭成功歷史的關心下，注意並嘗試敘述臺灣史。他說：

臺灣之民乃輾轉奴屬於異族者有年。其初為日本。芝龍既北去，日本邊民素出沒海上者，遂乘間佔有其地。於是其地為日本地，其民為日本民。其繼為和蘭。初，臺灣改隸日本，適德川氏當國，德川持鎖國主義，不復措意遠略，乃借其地於和蘭，約歲輸鹿皮三萬。和人乃征土番，造夾板船，又開互市於鎮城外，以兵千人守之。於是其地為和蘭地，其民為和蘭民。<sup>207</sup>

匪石雖反清，具強烈的漢民族主義信仰，但對於臺灣，則順從上述臺灣為日本舊領的觀點，「芝龍既北去，日本邊民素出沒海上者……其地為日本地，其民為日本民」這段無疑源自前述《臺灣鄭氏紀事》「芝龍去臺灣後，本邦邊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而紅毛來借地于本邦人」這段話，或丸山正彥對這段話的翻譯。有趣的是，在甲午戰爭前後一度在日本盛行的臺灣乃日本舊領的論述也在二十世紀初被中國人接受。當然，如同其所說：「日本國於吾東海之東，其文字同，其風俗同。吾中國海上豪傑不得志於政府者，大率流寓於是，……」<sup>208</sup>正是在這種「反滿」且「同文」的情感和社會情境中，鄭成功是「中國海上豪傑」，同時也可以是日本英雄。

---

<sup>203</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77。

<sup>204</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78。

<sup>205</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97, 102。

<sup>206</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102。

<sup>207</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99-100。

<sup>208</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75。

### （三）柳亞子與劉師培的鄭成功書寫

再者，柳亞子〈鄭成功傳〉應主要參照匪石的《鄭成功傳》，但其文中對於滿清的批判口氣更加激烈。相較於匪石擔心「歐洲入十九世紀」後，以其所發明的「殖民主義」在「亞東大陸」的發展；<sup>209</sup> 柳亞子則認知到鄭成功是中國第一位在海洋拓展，建立「殖民地」者，並說：「使天假之年……餘力猶多或盡取南洋諸島爭霸權于海上，闢屬地于環球以步英倫之後塵乎。未可知也」，更言若使鄭成功生於今日世界，則「民族帝國主義者方將出現于皇漢之歷史」。<sup>210</sup> 柳亞子比匪石更進一步，從「**民族帝國主義**」先行者角度評價鄭成功的歷史意義。

劉師培則在其文中提及《浙江潮》和《江蘇》的鄭成功論（即匪石的《鄭成功傳》和柳亞子〈鄭成功傳〉），但從「保種」、「闢地」、「沒有奴隸性質」（即強調鄭成功行事獨立，不受人干涉，不是為一姓之皇帝）、「實行家族的革命」（強調鄭成功不從父命，視民族重於家族）、「曉得內政」、「曉得外交」六點來評價鄭成功功業。我們可特別注意「沒有奴隸性質」、「實行家族的革命」，因這兩點實某種程度投射了廢君、廢家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sup>211</sup>

總之，從陳匪石到柳亞子和劉師培的鄭成功傳，中國民族英雄可說是他們三人共有的評價，但柳亞子和劉師培又各自從「民族帝國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想來評價鄭成功。又，相較於陳匪石之論，柳亞子和劉師培的鄭成功傳與上述日本的鄭成功相關著作的關聯比較薄弱，清末的鄭成功論述實有其鮮明的特色。儘管如此，不管是「民族帝國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其實應都與近代日本的思想資源有關。<sup>212</sup> 不過，這已非本文所要討論的範圍了。

眾所周知，清末時期，中國面臨來自西方國家與日本在軍事、政治和知識上，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知識人一方面大量吸收來自西方國家和日本的近代知識，一方面也開始思索如何將傳統王朝改造為民族國家。從歷史學的發展角度來說，一九〇二年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一文，提倡民族主義史學，在這一脈絡中，除鄭成功等民族英雄外，黃帝等中國歷史、傳說上的人物皆被用來打造中國

<sup>209</sup> 匪石，《鄭成功傳》，頁 115。

<sup>210</sup> 亞盧，〈鄭成功傳〉，頁 71。

<sup>211</sup> 安井仲介，〈婚姻家庭，自由之蠱賊也——中國無政府主義家庭革命論的意含〉，《政治科學論叢》74 (2017)：77-110。

<sup>212</sup> 藍弘岳，〈「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頁 248-249。

特色的民族國家。<sup>213</sup> 梁啟超說：「顧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布爾特奇之英雄傳，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贊嘆舞蹈，頑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sup>214</sup> 鄭成功無疑也符合這樣的英雄標準。

正是在此一打造國族的清末歷史背景中，鄭成功從逆臣轉為被祭祀的傳統王朝忠臣後，再轉換為凝聚近代民族國家認同所需的民族英雄。但在這一轉換過程中，用於合理化日本帝國擴張的鄭成功相關日本文本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追本溯源，近代日本書寫的鄭成功文本其實也大量依據《臺灣鄭氏紀事》，而如前述，《臺灣鄭氏紀事》也大量依據明清的漢文文本。正是在整個東亞國家間跨國的知識流動與文本翻譯過程中，在源於西方的新史學觀念介入後，鄭成功成為了中國的民族英雄。自此之後，在中國的歷史書寫中，鄭成功的主要角色就是民族英雄。直至今日，不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還是臺灣主體的歷史認知與教育中，鄭成功的角色與意義皆是如此。

基於上述的討論，筆者要再強調的是，《國性爺合戰》及其相關文學文本和戲劇對日本人形成「鄭成功也是日本人」的認知有所影響，也有助於喚起日本人的「海國」記憶，進而也會影響到明治時期的鄭成功相關敘事。但是就影響近代中國的鄭成功形象的程度來說，比起《國性爺合戰》，《臺灣鄭氏紀事》其實更重要。特別是就實際的文本與文本間翻譯和知識傳導過程來說，更是如此。

#### （四）朱希祖的鄭成功研究與《臺灣鄭氏紀事》

最後，上述清末中國的鄭成功相關著作投射太多時代與個人情感、思想於其中。近代中國真正重要的鄭成功研究應始於朱希祖。他於一九〇五年赴日留學，在留學期間也參加章太炎（1869-1936）主持的國學講習會，成為章太炎弟子。<sup>215</sup> 朱希祖致力於南明史籍的搜求、考訂等，可謂南明史學開創者。<sup>216</sup> 他之所以開始南明史學研究，也與《臺灣鄭氏紀事》有關。他說：「余於二十年前留學日

---

<sup>213</sup> 梁啟超，〈新史學〉，氏著，《飲冰室合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頁 89-107；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997）：1-77。

<sup>214</sup> 梁啟超，〈新史學〉，頁 29。

<sup>215</sup> 王愛衛，《朱希祖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頁 28-29。

<sup>216</sup> 王愛衛，《朱希祖史學研究》，頁 133-163。

本，得彼國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始治臺灣鄭氏史，然以鄰國所著我國史，雖詳瞻而多異聞，終不免有傳聞之誤。」<sup>217</sup> 可知〈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雖寫於一九三一年，然他的鄭氏家族研究乃至南明研究實受到二十年前留學日本時《臺灣鄭氏紀事》閱讀經驗的觸發。之後，在朱希祖等人的努力下，發掘《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和《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內閣大庫中之《平定海寇方略》）等第一手史料，並由史語所出版後，<sup>218</sup> 近代中國的鄭成功歷史研究方得以進一步發展。從此角度來說，《臺灣鄭氏紀事》對於近代中國鄭成功研究之開展也有重要意義。

## 八·結論

如上所述，本文從東亞知識史、思想史視野中，探究水戶藩儒川口長孺所編寫的《臺灣割據志》與《臺灣鄭氏紀事》兩書，在內容方面的異同、變化等問題。我們可看到川口長孺的書寫，大量參照明末清初時期的中國史料（漢文文本）。其中，包括許多清代禁書，且幾無採用清代官方的地方志。儘管如此，這些中國史料依然是在中國中心華夷秩序架構下寫出來的。然後，本文論述從受明末歷史書寫影響較深的《臺灣割據志》到《臺灣鄭氏紀事》的轉變，認為其轉變在於筆法和架構上，從帶有中國中心華夷觀念但正面看待日本的方式，修正為更加具日本中心華夷觀念的敘事模式。

《臺灣鄭氏紀事》出版後的幕末時期，日本也正開始重新面向海洋。並在明治時期向外擴張之際，鄭氏家族和「倭寇」皆成為歷史想像的對象。其書中「倭」（「倭寇」）與「牛皮借地」等歷史敘事情節的結合等等，提供了許多歷史想像材料，從而有《海外異傳》等相關漢文文本的誕生。在這些文本中，鄭成功除了與天皇家忠臣楠木正成的形象聯結在一起外，鄭成功母親田川氏對於鄭成功的日本英雄化，也具一定重要性。因為出身曖昧不明的鄭成功母親被賦予了寧死不受辱的日本女性道德模範角色，成功地聯結鄭成功與日本的關係，使日本能

<sup>217</sup> 朱希祖，〈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頁 26。

<sup>218</sup> 朱希祖，〈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頁 26；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另外，《平定海寇方略》的進一步研究，參閱孔令偉，〈《平定海寇方略》滿漢文本對勘·導論〉，《古今論衡》41 (2023)：140-144。

收取鄭成功行動所具有的「忠」、「義」、「勇」等道德訓戒價值。從而，鄭成功在日本開始面向海洋的幕末時期，被認知為「皇國之餘烈」，已確實被收編為日本的道德模範、海國英雄。進而在近代日本統治臺灣時，成為可被日本帝國利用的歷史人物。

《國性爺合戰》的相關文學文本乃至戲劇也在明治時期持續被書寫、表演，對於明治時期鄭成功形象的形成具重要意義。但《國性爺合戰》主要從神國思想，從「和藤內」（鄭成功）受日本神保護的相關敘事來強調其日本人的身分和情感的聯結。相較之下，《臺灣鄭氏紀事》等漢文文本則從儒學重視的貞節、忠義等道德心來評價鄭母及鄭成功，進而強調其日本人身分。在這一意義上，本文強調《臺灣鄭氏紀事》與其相關漢文文本，在日本對臺統治的政治與教育意義。

其次，意義曖昧不明的「倭」（「倭寇」）也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從而，本屬於「疆界人」的「倭寇」被收編為德川國家（前主權國家體制）的「日本邊民」（「我邊民」），繼而在近代主權國家基礎上打造的天皇制國家（「日本帝國」）中，在邊界活動的人群被收編為「日本人」。所以，在近代日本重新向海洋擴張之際，不只鄭成功，「倭寇」（「日本邊民」）也被理解為日本向外發展的過往豪傑，及在臺灣借地給荷蘭人的佔領者，從而有臺灣是日本「舊領」的論述出現，甚而再從天皇理應皇化世界角度賦予「倭寇」意義。在此種歷史認知中，明治日本領有臺灣後，來臺日本人的使命就是進行「同化」教育並「再皇化」臺灣。之後，隨著日本帝國向南擴張，在「南方關與」的行動與政策下，鄭成功的海洋英雄特質，及鄭氏一族過往在南洋的活躍歷史又更進一步受到關注。鄭成功不只是「皇國之餘烈」，更成了勇於向外擴張的「日本魂」（大和魂）代表人物，不斷地出現在許多殖民地教育和南進論述的文章，<sup>219</sup> 也有〈鄭成功と日本精神〉<sup>220</sup> 這類論文出現。總之，這誠是個重要問題，然本文篇幅已盡，有待後論。

再者，有意思的是，在清末中國的知識和社會脈絡中，將鄭成功打造為明室忠臣、「皇國之餘烈」、日本海國英雄的敘事文本，同時也有助於打造中國民族

---

<sup>219</sup> 例如：田中善立，《台湾と南方支那》（東京：新修養社，1913）；幣原坦，《南方文化の建設へ》；菊池寛，《海外に雄飛した人々（新日本少年少女文庫第2）》（東京：新潮社，1941）等等皆是。

<sup>220</sup> 柴田賢一，〈鄭成功と日本精神〉，佐藤義亮編輯，《日本精神講座》第9卷（東京：新潮社，1934），頁315-316。

英雄鄭成功。而且，「其地為日本地，其民為日本民」的歷史想像，也能由清末知識人接受並加以陳述。從這個角度來說，《臺灣鄭氏紀事》與其相關著作的效應不只停留在日本，甚也跨越國界，及於清末中國。但在清末中國，因「新史學」觀念和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等近代思想的引導，及在中國特有的情境下，其鄭成功形象和論述實相當不同於近代日本。而且，從南明史學大家朱希祖的南明史研究，往上追溯的話，也與他和《臺灣鄭氏紀事》的相遇有關。從這點來說，正是江戶日本保存了許多與南明相關的清代禁書，及據而編纂的著作，方得使清末中國知識人能借道日本，讀到許多禁書，乃至開始搜尋未傳到日本的手抄本資料，使明史研究得以更進一步發展。

總之，《臺灣鄭氏紀事》的特色和重要性在於，使用更多日本史料，更強調鄭氏家族與日本的聯結，使其除具明顯日本中心觀點外，在其成書後的頗長時間內，應是內容最為完整的鄭氏政權歷史著作。在來自西方的「新史學」觀點的臺灣史研究出現之前，該書在日本相當受到重視，其論述不斷被模倣、轉譯、闡釋，提供江戶後期乃至明治時期日本人需要的臺灣和鄭氏家族之歷史知識。鄭成功不僅是明室忠臣同時也是具「大和魂」之日本英雄，及臺灣是日本「舊領」的論述，皆可謂屬該文本所產生的效應。不過，就更廣的歷史脈絡來說，這也是日本漢學在江戶後期的成熟、日本化，及西方勢力重新逼近東亞等因素交錯所致。也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和東亞知識脈絡中，大量吸取明清歷史文本的鄭成功歷史書寫在相當程度日本化後，也能反之又被清末知識人運用，進而改寫。而且，該書也成為近代中國研究鄭成功和臺灣史的重要基礎文獻。

從東亞知識史和思想史來說，明清中國的文本傳到日本後，可能會被直接出版或在日本的語境中被改造、創造成新的敘事文本。如本文所論，因江戶日本與清朝中國屬不同政體，也不直接內在於清朝中國的天下秩序，兩者之政治制度與社會狀況也不同，故江戶學者必然會適度改寫中國原本的文本。又因語言差異，日本人以日文訓讀來閱讀和書寫漢文，故其生產的新漢文文本也會日本化，具日本漢文特色。其次，在日本出版的和刻本漢籍及被改造後的明清歷史敘事文本再傳入清末中國後，也會再度在清末政治社會中被理解、詮釋乃至創造新文本。因此，在東亞國家間的知識環流中，不管是漢字語詞和敘事文本從來都不是簡單的複製和貼上的關係。諸多文本因東亞各國間知識（包括語言、文字等）和社會脈絡差異所導致的曲折過程與複雜性，實有待吾人再深究。

## 藍弘岳

最後，再從全球史視野來說，如上述，鄭成功的忠臣形象其實受漢文文本結構和思惟制約，因傳統漢文文本對於偉大人物的歷史書寫本就傾向於從道德、政治角度來評價之。因此比較無宮崎來城所說的「西眼東視之弊」。然若要公允地評價鄭氏政權，除「東眼」之外，我們也需要以「西眼」來視之。但從「東眼」看待歷史的角度來說，《臺灣鄭氏紀事》無疑具重要意義。

所謂「東眼」與「西眼」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說是新舊史學的差異。舊史學（「東眼」視野下的歷史書寫）因其漢文文本結構，習於從「華夷」角度來看待世界，從忠義道德來評價人物。不管是中國中心還是日本中心，皆然。但新史學中的文明史學、民族主義史學是在這樣的舊史學基礎上展開的，只是在新史學的敘事中，「忠」的對象從君主轉為國家（乃至帝國）、民族。正是在這個轉譯過程中，鄭成功的形象可從抵抗夷狄的明室忠臣，及具日本血統與精神的日本英雄，轉變為打造國族所需的中國民族英雄，或面向海洋的帝國先鋒，抑或展開國際貿易的文明先行者。不管是新史學還是舊史學，不管是國史還是帝國史、抑或全球史，鄭成功和鄭氏政權皆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三日收稿；一一二年四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 後記

本文曾以〈江戶後期的臺灣歷史書寫：《臺灣鄭氏紀事》的編纂與其效應〉為題名口頭發表於史語所講論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22.06.06）。特別感謝史語所所長李貞德和會議主持人張谷銘等人的提問，使筆者能更進一步修正、深化相關思考。還有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委也給予本文許多中肯且具啟發性的意見，使本人獲益良多。最後，感謝張淨嵐幫助校閱本文。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世宗憲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丁紹儀，《東瀛識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丸山正彥，《臺灣開創鄭成功》，東京：嵩山房，1895。
- 丸山正彥著，張鑄六譯述，《臺灣開創鄭成功》，東京：四素寄廬，1903。
- 丸田猷彥，《冒險遠征傑士伝》，東京：大倉書店，1892。
- 于雅樂 (Camille Imbault-Huart) 著，郭維雄譯，《福爾摩沙之歷史與地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
- 小宮山楓軒，《議臺灣別志》，寫本，東京：國會圖書館藏。
- 川口長孺，《征韓偉略》，大阪：河內屋茂兵衛，1831；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 川口長孺，《海防微言》，寫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 川口長孺，《綠野園集稿本》，自筆稿本，東京：國會圖書館藏。
-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
- 川口長孺，《臺灣割據志》，寫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水戶：須原屋安次郎，1828；長崎：長崎大學附屬圖書館經濟學部分館武藤文庫藏。
- 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 甲編》，北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1931。
- 今村榮一，〈朱成功傳〉，原田稔甫編，《今村榮一遺稿》，東京：原田稔甫，1904。
- 內藤耻叟，〈臺灣はもと我所屬なりし事〉，《皇典講究所講演》168 (1896)：21-27。
- 內藤耻叟，〈臺灣舊領考〉，《國光》14.2 (1897)：40-41。
- 王士禎，《香祖筆記》，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清史資料彙刊》子部第 15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王瑛曾纂修，《重修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加藤兵吉著，染崎延房編輯，《臺灣外記》，東京：加藤兵吉，1874。

藍弘岳

- 外務省調査部編纂，《大日本外交文書 卷七》，東京：日本國際協會，1937。
- 田中善立，《台灣と南方支那》，東京：新修養社，1913。
- 田代幹夫編，《臺灣軍記》，東京：河内屋文助，1874。
-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上卷。
- 光漢，〈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中國白話報》20 (1904)：7-14。
- 光漢，〈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續）〉，《中國白話報》21-24 (1904)：41-58。
- 朱希祖，〈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序〉，《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
- 江樹生主譯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II 1627-1629》，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
- 西川正休編，《長崎夜話草》，收入《長崎叢書》第1卷，長崎：長崎市役所，1926。
- 佐藤治郎吉編，《少年寶庫 日本男兒》，東京：東京堂，1891。
- 何喬遠編撰，《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 村上玉吉，《臺灣紀要》，東京：警眼社，1899。
- 村上直次郎譯註，《バタビヤ城日誌 上卷》，東京：日蘭交通史料研究会，1937。
- 谷三山著，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編，《三山谷先生遺稿》，奈良：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1917。
- 足立栗園，《臺灣志》，東京：哲學書院，1894。
- 那珂通世，〈臺灣人に關する意見〉，《臺灣教育會雜誌》23 (1904)：1-10。
- 那珂通世，〈臺灣朝鮮滿州史研究の枝折〉，《史學雜誌》11.1 (1900)：53-70。
- 那珂通世口述，三屋大五郎譯，〈關臺灣人之說〉，《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23 (1904)：1-8。
- 亞盧，〈鄭成功傳〉，《江蘇》4 (1903)：61-71。
- 周元文纂修，《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6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4-4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東條保，《臺灣事略》，東京：小倉萬次郎，1875。
- 松本愛重，《少年叢書 本朝立志談 初篇》，東京：少年園，1890。
- 松島剛、佐藤宏編，《臺灣事情》，東京：春陽堂，1897。
- 林燿（林復齋）編，《通航一覽》，東京：國書刊行會，1913。

- 林謙光，《臺灣紀略》，收入《澎湖臺灣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近藤瓶城編，《史料通信叢誌》，東京：史料通信協會，1893-1898，第 14 本。
- 信濃教育會編，《伊沢修二選集》，長野：信濃教育會，1958。
- 姚覲元編，《清代禁毀書目四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施琅，《靖海紀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秋鹿見橘，《臺灣史要》，東京：成美堂，1895。
- 范咸纂修，《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茅元儀輯，鵜子直訓點，《武備志》，大阪：賭春堂，1792。
- 匪石，《鄭成功傳》，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宮崎來城，《鄭成功》，東京：大學館，1903。
- 柴田賢一，〈鄭成功と日本精神〉，佐藤義亮編輯，《日本精神講座》第 9 卷，東京：新潮社，1934。
- 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乾隆）福建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27-5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高拱乾纂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副島種臣，《副島種臣關係文書》，東京：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 國史館編，《逆臣傳》，出版地不詳：國史館，1932。
-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
- 張廷玉等撰，鄭天挺點校，《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梁川星巖，《西征集》，收入《星巖集 乙集》，江戶：千鍾房，1841。
- 梁啟超，〈新史學〉，氏著，《飲冰室合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
- 連橫，《臺灣通史》，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2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陳第，〈東番記〉，沈海容輯，《閩海贈言》，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朝川善庵，《鄭將軍成功傳》，江戶（東京）：玉巖堂，1850。
- 森田節齋，〈與齋藤有終書〉，《節齋遺稿》，奈良：奈良縣宇智郡教育會，1910。

## 藍弘岳

- 森田節齋，〈與齋藤督學論其所著海外異傳書〉，《森田節齋草稿》，寫本，奈良：奈良縣圖書館藏。
- 森貞次郎，《山田長政暹羅偉蹟》，東京：春陽堂，1887。
- 無名陳人，《海外異傳匡謬：附國姓爺系圖》，奈良：紅樹書屋，1852。
- 菊池寬，《海外に雄飛した人々（新日本少年少女文庫第2）》，東京：新潮社，1941。
- 飯田忠彥，《野史》，東京：國文社，1881-1882。
- 黃獻臣，《武經開宗》，出版地不詳：芙蓉館，1636。
- 塩谷宕陰著，內田周平編，《宕陰牘稿》，東京：谷門精舍，1931。
- 董天工，《臺海見聞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12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 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31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7。
- 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1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
- 鄭亦鄒，《鄭成功傳（又名國姓爺傳）》，浪花（大阪）：河內屋茂兵衛，1771-1773；刊本，名古屋：蓬左文庫藏。
- 齋藤拙堂，《海外異傳》，出版地不詳：惜陰書屋，1850。
- 魏源，《聖武記》，北京：琉璃廠，1844；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 關口隆正，《山田長政伝：附牛山復讐録》，静岡：著草深十丈書屋，1892。
- 關口隆正，《臺灣歷史歌》，東京：村田直景，1900。

## 二・近人論著

### 孔令偉

- 2023 〈《平定海寇方略》滿漢文本對勘・導論〉，《古今論衡》41：139-144。

### 方豪

- 1969 《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總經銷。
- 1994 《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毛一波

- 1961 〈清廷對鄭成功的賜葬建祠和追諡〉，《臺灣文獻》12.1：32-36。

### 王汎森

- 2013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臺灣鄭氏紀事》與鄭成功和臺灣歷史書寫：從江戶日本到清末中國

- 王明珂  
2015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臺北：允晨出版社。
- 王彬主編  
1999 《清代禁書總述》，北京：中國書店。
- 王愛衛  
2018 《朱希祖史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安井伸介  
2017 〈婚姻家庭，自由之蝨賊也——中國無政府主義家庭革命論的意含〉，《政治科學論叢》74：77-110。
- 江仁傑  
2006 《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臺北：三民書局。
- 吳正龍  
2000 《鄭成功與清政府間的談判》，臺北：文津出版社。
- 吳哲夫  
1969 《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 沈松僑  
1997 〈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77。  
2000 〈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77-158。
- 周婉筠  
2012 《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周憲文  
1958 〈後記〉，川口長孺，《臺灣鄭氏紀事》，頁77-78。
- 林以衡  
2010 〈日本旅臺文人宮崎來城在臺漢文學創作與評論初探〉，《臺灣學研究》9：97-122。
- 徐曉望  
2021 〈早期臺灣祕史：論晚明海寇林道乾在臺灣的活動〉，《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3.1：5-34。
- 高致華  
2006 《鄭成功信仰》，合肥：黃山書社。
- 寇淑婷、曹順慶  
2021 〈日本的鄭成功形象建構及其對臺灣的文化殖民〉，《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33：162-170。

藍弘岳

張崑將

2020 〈從東亞視域看鄭成功形象的「中華」意識之爭〉，《深圳社會科學》2020.2：51-65。

曹永和

1979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陳宗仁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 (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黃美娥

2004 〈點校說明〉，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臺灣史料集成 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1冊。

董灝智

2019 〈江戶—明治文學家對“鄭成功形象”的日本化建構——兼論中日視野下“鄭成功形象”的變遷〉，《文學評論》2019.6：107-114。

雷夢辰

1989 《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劉家幸

2018 〈片帆敵愾震四海——日本漢文小說《海外異傳》中英雄書寫的敘事結構〉，《文與哲》33：289-324。

鄭維中著，蔡耀緯譯

2021 《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新北：衛城出版社。

藍弘岳

2012 〈面向海洋，成為西洋：「海國」想像與日本的亞洲論述〉，《文化研究》14：273-315。

2020 〈你的忠臣也是我的英雄：鄭成功、江戶文藝與日本帝國的臺灣統治〉，《思想》（臺北）41：157-201。

2022 〈「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3.1：213-272。

龔纓晏

2006 《求知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大阪每日新聞社京都支局編

1939 《維新の史蹟》，大阪：星野書店。

大庭脩

1967 《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收入《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叢刊》第1冊，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

- 大浜郁子  
2002 〈「琉球教育」と台湾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日清戦争前後の学務官僚児玉喜八の動向を中心に〉，《沖繩文化研究》28：351-382。  
2003 〈内藤耻叟における日本の台湾領有論〉，《沖繩文化研究》29：409-434。
- 小宮木代良  
1990 〈「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に対する家光政権の対応—正保三年一月十二日付板倉重宗書状の検討を中心として—〉，《九州史学》97：1-19。
- 井坂清信  
2013 《江戸時代後期の水戸藩儒——その活動の点描——》，東京：汲古書院。
- 太田弘毅  
2002 《倭寇——商業・軍事史的研究》，横浜：春風社。
- 石原道博  
1945 《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  
1964 《倭寇》，東京：吉川弘文館。
- 吳華君  
2003 〈那珂通世による「朱成功」顯彰と大日本帝國の構想——「一視同仁」と差別の關係性に対する考察として〉，《年報日本思想史》21：18-32。
- 李領  
1999 《倭寇と日麗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村井章介  
1993 《中世倭人伝》，東京：岩波書店。
- 岩生成一  
1927 〈豊臣秀吉の臺灣征伐計畫について〉，《史學雜誌》38.8：750-763。  
1942 〈豊臣秀吉の臺灣島招諭計畫〉，《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7：75-118。  
1987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人〉，《続南洋日本町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頁 281-302。
- 松永正義  
2008 〈台湾領有論の系譜〉，氏著，《台湾を考えるむずかしさ》，東京：研文出版社，頁 231-285。

藍弘岳

- 林田芳雄  
2004 《鄭氏台湾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東京：汲古書院。
- 直井文子  
2002 〈齋藤拙堂の『海外異傳』とその匡謬書とについて〉，《斯文》110：14-30。
- 長澤規矩也  
1974 〈解題〉，《和刻本明清資料集 第二集》，東京：汲古書院，頁1-5。
- 茂木敏夫  
2015 〈《海国図志》成立の背景——中国社会の変動と経世論〉，《洋学》19/20：147-165。
- 真壁仁  
2007 《徳川後期の學問と政治：昌平坂學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變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學。
- 神田信夫  
1987 〈『聖武記』雜考〉，《東方学会創立四十周年記念 東方学論集》，東京：東方學會，頁305-320。
- 張虎  
2001 〈副島对清外交の検討——副島外務卿宛て勅旨を素材にして——〉，《明治維新とアジア 明治維新研究》6，東京：吉川弘文館，頁30-60。
- 渡辺浩  
1985 《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勢田道生  
2013a 〈《大日本史》写本卷首目録の対照：柳沢文庫蔵本・酒井家文庫蔵本による〉，《詞林》54：41-63。
- 2013b 〈津久井尚重《南朝編年記略》における《大日本史》受容〉，《近世文藝》98：31-44。
- 源了円  
1993 〈幕末・維新时期における「海國図志」の受容——佐久間象山を中心として〉，《日本研究》9：13-25。
- 萩原新生  
1942 《南海雄飛の人々》，東京：皇國青年教育協會。
- 幣原坦  
1938 《南方文化の建設へ》，東京：富山房。

藤田覚

2005 《近世後期政治史と対外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Andrade, Tonio

2008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roizier, Ralph C.

1977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Hang, Xing

2016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1620–17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三・網路資訊

青蘋果數據中心「申報 (1872-1949) 資料庫」

1874 〈接續辯謬杞憂生述征番稿〉，《申報》第 726 期，1874.09.09，讀取 2022.05.20。

1878 〈新書出售〉，《申報》第 1809 期，1878.03.21，讀取 2022.05.20。

*Chronicle of the Zheng Family of Taiwan*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on Zheng Chenggong and Taiwan:  
From Edo Japan to Late Qing China

Hung-Yueh La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Tei shi kiji* 臺灣鄭氏紀事 (*Chronicle of the Zheng Family of Taiwan*) is a historical work detailing the affairs of Zheng Chenggong's 鄭成功 (also known as Koxinga 國姓爺, 1624–1662) family and was compiled by Kawaguchi Choju 川口長孺 (1772–1835), a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Mito domain of the Edo period, after receiving an order from the daimyo of Mito, Tokugawa Narinobu 德川齊脩 (1797–1829). To compile the book, Kawaguchi based it on *Taiwan kakkyochi* 臺灣割據志 (*History of an Autonomous Taiwan*), and after accepting the suggestions of his peers, revised and published *Chronicle of the Zheng Family of Taiwan*. In the present paper, I first examin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orks. Second, to demonstrate how Mito Confucian scholars constructed Taiwan historical writings with a Japanese-centered worldview, I explore how texts on the Zheng family and Taiwan history produced in Ming and Qing China were read, translated, and re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of Edo Japan during the compilation of *Chronicle of the Zheng Family of Taiwan*. Subsequently, the influence of *Chronicle of the Zheng Family of Taiwan* on the representations of Zheng Chenggong and Taiwan historical writings from the late Edo to Meiji period is discussed. In this section, I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ow Zheng Chenggong's Japanese mother grad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initiated discussion during the late Edo and Meiji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ork, as well as scrutin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age of Zheng's mother as a virtuous woman and his image as a Japanese hero under the pressure of approaching Western power and the influence of Edo Confucianism. Fourth, I explore how Zheng Chenggong's maritime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political endeavors were woven into Japan's historical memory. I then proceed to exp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onicle of the Zheng Family of Taiwan* and the discourse on Taiwan originally being part of Japan, which emerged in the Meiji period.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concerning Zheng Chenggong and Taiwan from the Edo period and onward were utilized and re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of late Qing China. Through the above, the present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meanings underlying the compilation of *Chronicle of the Zheng Family of Taiwa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circulation within 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ast Asian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even global history.

**Keywords:** East Asia; Edo Japan; Zheng Chenggong (Koxinga); Taiwan; historical writings